

分类号 J06/16
U D C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造型艺术研究

研究生姓名: 郭蕊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牛勇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设计学

研究方向: 设计历史与理论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3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郑蕊 签字日期： 2024.6

导师签名： 牛勇 签字日期： 2024.6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郑蕊 签字日期： 2024.6

导师签名： 牛勇 签字日期： 2024.6

Research on the Sculpture Art of Western Zhou Bronze Ware in Baicaopo, Lingtai, Gansu

Candidate : Guo Rui

Supervisor: Niu Yong

摘要

甘肃地区位于中国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甘肃地区的历史上，青铜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青铜器作为当时重要的器物，其造型艺术特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灵台密须古国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东邻周朝、西接犬戎、南望蜀汉、北望匈奴，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灵台密须古国在古代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是我国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其造型艺术和审美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通过研究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造型艺术和审美文化两个方面来揭示西周时期灵台白草坡青铜器设计特征及文化内涵。首先总结了甘肃地区青铜器总体的发展情况和甘肃省灵台白草坡青铜器具体的发掘情况；其次，将青铜器物进行分类，分别研究不同青铜器的纹饰、造型、铭文的及历史背景等多方面特征，与同时代不同地区青铜器作比较，突出白草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设计特点，论述整个甘肃地区青铜器的审美特征；最后，从审美文化角度去研究白草坡青铜器背后的社会意义、文化内涵、历史价值，以及审美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由小到大，由浅至深，探寻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独特魅力。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独特设计艺术所展示出的西土地域风格、丰富的纹饰图案、优良的材质特点和艺术价值，成为古代艺术中的瑰宝。这些器物焕发着自己的生命力，都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及设计手法相互映衬，包含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和来自中原宗法制、礼乐制度。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发掘出更多西北青铜器的艺术风貌，为研究者们提供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西周 青铜器 白草坡 审美文化

Abstract

Gansu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and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In the history of Gansu region, bronze war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s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n important artifact of that time, bronze ware's artistic features reflect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tyle of that time.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Lingtai Mixu Ancient Kingdom has extremely high strategic value,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provinces. It borders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east, Canrong to the west, Shu Han to the south, and Xiongnu to the north. Thi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made Lingtai Mixu Ancient Kingdom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ancient times. The bronze artifact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Baicaopo, Lingtai, Gansu Province are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in China. Their plastic arts and aesthetic culture have high research valu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Lingtai Baicaopo bronze war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by studying its sculptural art and aesthetic culture. Firstly,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bronze artifacts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specific excavation of bronze artifacts in Baicaopo, Lingtai, Gansu Province were summarized; Secondly, classify the bronze artifacts and study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shapes,

inscription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different bronze artifacts. Compare them with bronze artifac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era, highlight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Baicaopo area, and discus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artifacts in the entire Gansu region;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cul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connotation, historical valu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historical culture behind the Bai Cao Po bronze ware. From small to large, from shallow to deep, it explores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Western Zhou bronze ware in Bai Cao Po, Lingtai, Gansu.

The unique design art of bronze ware in Gansu region showcases the Western regional style, rich decorative patterns, excellent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value, making it a treasure in ancient art. These artifacts radiate their own vitality, each with a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sign techniques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cluding grassland culture from northern nomadic ethnic groups and the ancestral and ritual system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e look forward to discovering more artistic styles of Northwest bronze artifacts in future research, providing researchers with richer aesthetic experiences.

Keywords: Bronze wa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ai Caopo; Aesthetic Culture

目 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2
1.3 研究方法重点及难点.....	4
1.3.1 研究方法.....	4
1.3.2 本文重难点.....	5
2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发展概况.....	6
2.1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早期发展.....	6
2.2 甘肃地区青铜器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互动.....	8
2.3 独特的密须国青铜文化.....	11
2.3.1 密须古国.....	11
2.3.2 密须国的青铜器特征.....	12
3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遗存与发现.....	13
3.1 青铜器的遗存与发现.....	13
3.2 灵台白草坡B ₁ 爰伯与濼伯.....	15
4 甘肃灵台白草坡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	17
4.1 青铜器造型分类特征.....	17
4.1.1 酒器类.....	17
4.1.2 食器类.....	27
4.1.3 兵器类.....	33
4.1.4 车马器类.....	40
4.2 青铜器造型艺术设计中体现的审美特征.....	41

4.2.1 纹饰与节奏韵律之美.....	41
4.2.2 器物与和实生物之美.....	43
4.2.3 礼制与篆引铭文之美.....	44
5 甘肃灵台白草坡青铜器中所体现的审美文化解读.....	46
5.1 审美价值.....	46
5.2 社会意义.....	47
5.3 文化内涵.....	48
5.4 审美与历史文化的联系.....	49
6 结语.....	50
参考文献.....	52
附录.....	57
致谢.....	59

1 绪论

青铜时代是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人类制造器物的历史大约经过了300多万年的打制石器和数千年的磨制石器，直到距今几千年前，青铜器的冶炼才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使用金属工具的文明时代。在地域广袤的中国，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青铜之路，就已经活跃于夏、商、周时期，而位于青铜之路的西北地区—甘肃，地处中国三大高原的交界地带，呈狭长状且地貌复杂多样。甘肃是古代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前沿地带，也是中国最早出现青铜器的地区之一，发达的青铜器文化和马匹的驯养促成了经济发展和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①而在甘肃东部的泾、渭河流域是周、秦的发源地，灵台地处泾水和渭水之间，北接龙源、南依岐凤、东临关中。

殷末周初，白草坡西南三十里的百里镇附近的密须国分布着众多的异族和小的方国，包括“戎狄之邦”和与殷联盟的势力。灋、卽爰地当为泾水诸国通向宗周的咽喉，北方民族出入之要冲。青铜器的造型形制、纹样及铭文一系列的设计，是当时人类社会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物化，它的设计理念中所包含的时代性、艺术性、审美意识牵涉出一条历时性和精神性的文脉遗绪，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就已化身为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人文风俗、审美尚趣、造物理念的物化喻体。^②通过研究这批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特征及审美文化，揭示出中原文化和草原青铜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古人的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生活现象、墓葬遗俗等各方面的不断探索。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青铜器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了解远古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产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关注到中国史前文化与西方的联系，并且注意到西北及北方地区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域。甘肃地区的早期青铜器呈现出本地传统与外来因素的并存，而其本身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经济条件，也使其成为欧亚草原与中

① 刘晓. 甘肃早期青铜器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② 朱尽晖. 从商周青铜器的审美意识反观当下中国美学[J]. 新美术, 2017, 38(09):92-95.

原内陆之间远距离交流的重要环节。^①西周是中国古代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其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分封制是周王朝长期推行的“国策”，是西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对西周诸侯国的研究，成为解决周王朝社会结构及其疆域管理等诸多问题。^②随着区域青铜器的研究和蓬勃发展，诸侯墓葬中的青铜器成为探索周代社会状况的必要途径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周诸侯国史料不足，成为研究西周史的重要资料。西周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代，具有独特的青铜艺术特征，在制作工艺、纹饰、造型设计方面已经娴熟地将各种复杂工艺进行综合运用，在一个“中和、礼制”的社会环境中蓬勃发展。周代的青铜器呈现质地优良、精湛的工艺、精雕细刻的铭文和自然优美、富有韵律美的纹饰贯穿整个时代的发展。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是我国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其艺术特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信息，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其研究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早期西北地区的铜器，并不是单纯地受某一种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甘肃地区文化系统与周、密、秦、戎等文化体系并存的局面。^③探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艺术，通过对西周时期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一系列文物在造型、纹饰、铭文的设计特点，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游牧民族草原文化交流及设计艺术的审美文化特征。

1.2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首次对中国青铜器起源问题进行讨论的是刘学堂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论述：在甘青一带出现的青铜器群，其年代早于中原、北方地区。从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早期的青铜器是由西北地区向中原大陆地区和华北地区延伸的趋势。^④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是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第

① 王璐. 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D].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② 王璐. 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D].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③ 王璐. 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D].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④ 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中原文物, 2012, (04): 51-57.

29号房址中出土的一块残铜片，时代上仅次于那件铜片的便是山西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的铜渣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骨笛上发现的铜锈，它们的年代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①

而对西周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4年，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中首次提出“周器为殷器之后，而殷器为周器之前”，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7年，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首次对西周青铜器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对西周青铜器的起源、分期、地域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②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自20世纪初以来，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1976年出版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历史地位、文化内涵以及铸造技艺等方面。根据《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遗址发掘简报》一文详细记录了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遗址的发掘情况，以及出土的各类青铜器。

李学勤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鉴赏》一文中记述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在学术研究方面，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年代与铸造技艺：学者们通过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合金成分等研究，推测其铸造年代以及铸造技艺水平。例如，李学勤通过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分析，认为这批青铜器属于西周中期。1999年出版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对西周青铜鸟纹、窃曲纹、兽面纹进行分型分式。

1993年周泗阳《中国青铜器图案集》收集了兽面纹、龙纹、凤鸟纹、火龙纹、环带纹、鳞纹、人像纹等十九种纹饰，但本书并没有文字说明。^③

① 刘学堂,李文瑛.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C]//藏学学刊(第3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64.

②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M]. 科学出版社, 1957.

③ 周泗阳.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2. 审美特征: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美学热的先声, 他以一种体会、感受和理性思考、分辨相结合的方式, 向大家展现了中国古代近 8000 年的文化艺术境界,^①李泽厚提出“有意味的形式”, 认为汉字、青铜纹饰、建筑艺术等都是文与质的结合。^②

3. 文化内涵: 学者们从历史文献、考古发掘报告等文献资料中, 挖掘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文化内涵。例如, 李学勤通过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纹饰、器形等分析, 认为这批青铜器反映了西周时期王权与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

4. 社会功能: 学者们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进行研究, 探讨其礼仪、宗教、军事等功能。例如, 李学勤通过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器物组合陈设、器物数量等分析, 认为这批青铜器具有礼仪、宗教等功能。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研究现状表明, 该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年代与铸造技艺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年代的确定以及铸造技艺的深入研究。文化内涵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仍需进一步挖掘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信息。

1.3 研究方法及重难点

1.3.1 研究方法

文献归纳法: 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调研资料, 全面收集青铜器起源、发展背景, 西周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西周灵台白草坡青铜器的审美特征中的相关文献、书籍及影像资料, 仔细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进行分析整合。

实地调查法: 在基本了解选题现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调查, 参观甘肃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灵台县博物馆等。对甘肃地区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的

^① 关婧雯. 周代形式美思想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② 李泽厚《美的历程》[M]. 文艺理论著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1 年首次出版

归纳总结，将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的纹饰做系统的整理研究，从具体的范例来探讨西周灵台白草坡青铜器的审美艺术特点，对器物的纹饰、铭文、铸造工艺、设计理念等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同时，实物观察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对西周青铜器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青铜器造型艺术为载体，从审美文化角度来研究西周青铜器所体现的社会文化。

1.3.2 本文重难点

第一，甘肃地区青铜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情况；

第二，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的独特设计之处；

第三，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及审美文化的解读。

本文通过研究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的造型特点，从而产生思考，这一时期青铜器已化身为宗教信仰、政治、社会、人文、造物理念的物化喻体。不同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甘肃地区受到更多不同区域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的交融背景下甘肃地区独有的青铜器艺术。国内对于青铜器的起源及西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仍在做进一步研究，西北地区族系众多，形成不同的草原文化，人们迁徙无常，缺乏整体的连续性，从青铜器物中找到不同文化相互联系的要素，同时如何展开并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挑战。

西周青铜器整体设计中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和相称比例关系既符合力学要求，又体现了视觉的美感要求，并向着简单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虚实统一、有无相生中突显了器物的实用性和装饰性。其纹饰方面的设计运用平面阴刻线表现立体特征突出肌理感，粗细线条表明画面元素的前后虚实关系。^①动物纹饰的设计逐渐简化并富有图案趣味。神秘色彩淡化，纹饰重视抒发性情。^②其造型艺术之路，由凝重走向轻灵；由繁复走向简朴；由怪诞走向平易；由神魔的世界走向世俗的世界，走向解放，走向审美意识的解放。

① 李广庆. 谈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J]. 黑龙江史志, 2012, (07): 12+16.

② 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道客巴巴. 互联网文档资源 (<http://www.doc88.com>)

2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发展概况

2.1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早期发掘状况

中国早期的青铜器地区主要有：中原地区、甘青地区、北方地区、海岱地区和南方地区。青铜器的发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社会化的分工和阶段分工。从大量的考古发掘来看，青铜器的墓葬和文化遗址都来自社会上层等级人物，目前发掘的青铜器礼器和青铜兵器均都出自贵族墓葬中，这反映了早期国家“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的特点。^①青铜器的冶炼与使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研究青铜器器物的发展史，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有重要帮助。

迄今为止，我国最早发现于中原地区仰韶时期遗址的铜器，出土于陕西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第 29 号房址中的一块铜残片。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②时间上仅次于那件铜片的还有山西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的铜渣，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骨凿上发现的铜锈，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3000 年。如果这两件铜器判断无误，那么就可得出结论：早公元前 4675±3000 年左右，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冶铜活动，开始了对原始铜和铜合金冶炼技术的探索。^③中原地区出土了大量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青铜器，铜器及各类冶炼遗物达 294 件，从一期到四期出土铜器 131 件，墓葬出土铜器 38 件，其他的遗址出土铜器 41 件。一期和二期出土数量较少，一期遗址出土铜刀 2 件；二期遗址和墓葬出土铜刀 3 件，铜铃 4 件，铜块、铜锥和兽面铜牌饰各 1 件；三期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种类开始增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工具类：铜镑 2 件，铜凿 2 件，铜鱼钩 2 件，铜锥、铜纺轮、铜锯各 1 件、铜刀 16 件；兵器类：铜钺 7 件，铜戈 2 件，铜钺 1 件；铜容器类：铜爵 6 件，镶嵌绿松石圆形器和铜泡形器各 1 件。^④由二里

① 詹婷.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② 严文明.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J]. 史前研究, 1984, (01): 36-44+35.

③ 詹婷.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巧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R]，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80-81/137、168--171、195--196、239--240、249、251--252、255--256 页、268--270、299、328、332—333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巧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 4 期，第 238--239 页。

头文化开始，逐渐发展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文化达到了鼎盛。

通过以上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来看，中原地区的早期青铜器出现时间较早，但是发展缓慢，公元前 4675±135 年只有铜片和铜渣，直到龙山文化后期才渐渐发展起来。二里头文化遗址直到三、四期，青铜器群才真正开始出现，在此之前都是一切青铜残片、铜条等，那么二里头三、四期突然兴起的青铜文化，无论是从文化风格上还是造型特征上，都没有找到确切的发展遗迹，如果在当地找不到任何的起源线索，那么是否会将视野放到其他地区，例如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二里头青铜文化的崛起是否受到外来影响，这一点值得深思。

而处于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地区，公元前 3 千纪末就出现了组合复杂的青铜器。^①在早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早期铜器遗址只有马家窑文化，1977 年出土的东乡县林家马家窑类型出土了一件青铜刀，还有几块铜渣。^②龙山时期有四处，马厂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马厂文化出土早期铜器 3 件：永登蒋家坪 1 件铜刀、酒泉照壁滩 1 件铜锥、高苜蓿地 1 块炼铜块。甘肃省齐家文化出土的早期铜器遗址有 11 处，主要有：武威皇娘娘台出土铜刀、铜锥、铜饰等 30 多件铜器；永靖秦魏家出土铜斧、铜环等 8 件铜器；^③永靖大河庄出土铜匕、残铜片 2 件；^④广河齐家坪出土带銎斧、铜镜、人面匕首 3 件；^⑤广河西坪出土铜刀一把；^⑥岷县杏林出土铜刀铜斧 2 件；^⑦积石山县新庄坪出土早期铜镞、铜泡、铜刀等 12 件；^⑧康乐商罐地出土铜刀一把；甘肃临潭县陈镇磨沟出土早期铜器铜斧、铜刀、环首铜削、耳环、铜泡、铜珠等 100 多件，是目前

① 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中原文物, 2012, (04): 51-57.

② 詹婷.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第 74、87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第 53—54 页。

⑤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第 141—142、151 页。

⑥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第 1 期，第 9 页.孙淑云、韩汝汾.《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研巧》，《文物》，1997 年第 7 期，第 79 页。

⑦ 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 年第 2 期，第 97 页。

⑧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 年第 11 期，第 51 页

考古发掘齐家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址。^①另外到公元前二千纪初到二千纪中,还有甘肃玉门火烧沟、甘肃玉门沙锅梁、酒泉市干骨崖、甘肃安西鹰窝树、甘肃民乐东灰山等文化遗址出土了权杖头、铜斧、铜管、骨柄铜锥、铜泡等青铜器物。

西北地区青铜器的考古发掘,很早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甘青地区出土了目前我国数量最多的早期青铜器,但真正对此地区的青铜器文化进行分析讨论,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还是近几年的事。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在公元前 22 世纪至 18 世纪的中原文化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目前在齐家文化中发现了 130 多件铜器,均发现在姚河以西。四坝文化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部,目前据统计,河西四坝文化出土的铜器在 300 多件,其中火烧沟墓地是四坝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存,312 座墓中随葬的铜器超过 200 件。

那么在公元前 3 千纪到公元前 3 千纪之末,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只有零星的铜器被发现,青铜器的冶炼和制作技术还未被人们完全接受。新疆、甘青一带的古代居民直到公元前 3 千纪末,才熟练地掌握了冶铸铜器的技术和制作方法,进而创造出了发达的青铜文化。^②

例如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四羊首青铜权杖头、环首青铜刀都体现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时期,甘肃人民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铸铜技术,并且设计出独具匠心的造型便于使用,尤其是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刀”,到头略带翘意,刃部较厚重,方便切割肉食,距今约 5000 年左右。

2.2 甘肃地区青铜器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在整个中国早期的青铜器起源问题研究方面,一直存在争议,早在 6000 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代表作品为苏美尔时期设计雕刻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西方利用青铜器的时间比中国早了 1000 多年。“本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 年第 7 期,第 17 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09 年第 10 期,第 15、23 页;徐建炜:《甘青地区新获早期铜器及冶铜遗物的分析研究》,北京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21 页。

^② 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中原文物, 2012, (04): 51-57.

土说”认为：西方是砷铜，中国是锡铅铜，西方是锻造术，中国是铸造术。西北地区以个人装饰品为主，小兵器为辅，而中原地区以青铜容礼器为主。“外来说”认为：在新疆天山、哈密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甘青地区出土的部分铜器，比齐家文化更早，而齐家文化出土的青铜器不晚于中原地区。专家推定：齐家文化有可能是青铜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传到甘青再传入中原，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这一条青铜之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证明了新疆发现的青铜器很可能来源于欧洲，而且在甘青、新疆地区也发现了砷铜。^①

甘肃作为最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区域，无疑受到了来自各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影响，从整个中国早期的青铜起源和传播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地区、西北地区，它们的发展必然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一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何来验证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发展呢？那么这就需要专家学者们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是铜器的含量问题，最早期出土的一般为黄铜，其次是红铜，公元前5千纪到公元前4千纪上半叶，人们开始使用砷铜，到公元前2千纪初期，锡青铜才正式取代砷铜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合金。不同时期出土的铜器含量不同，成分比例不同，根据地区的分类对比确定其制作年代。

其次是铜器的形制，古代人们最初制作出铜器用来生活，大多是一些生活类的工具，在成立了部落之后人们有了审美意识，开始设计并制造出形式与功能统一的铜器，再到后来人们有了宗教信仰和国家政权，就出现了大批的青铜祭祀、随葬的礼器、酒器、食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出现了兵器、车马用具等，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根据不同时代人们社会的生产力、生活所需而造。

最后是纹饰、铭文、具体的墓葬，学者们根据某一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器物，根据上面的铭文来断定墓主人所处的年代、身份地位、功勋战绩等，通过青铜器物上的纹饰与周边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出现的纹饰进行比较，发现其特点。

在甘肃地区主要是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辛店文化等都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甘肃地区青铜器的出现无疑受到了周边青铜文化的影响。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

^① 詹婷.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出现在了新疆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林亚文化，甘肃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中。^①

上文中提到的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发展起来的青铜器不早于北方青铜器，但相较于新疆、青海、甘肃地区要略晚。^②由此可见，甘肃地区早期的青铜器并不是受到东方影响，而是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

新疆的古墓沟—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普遍发现的青铜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2 千纪初，这一时期的铜器类型呈多样化，技术较为先进。^③而这个时期的甘肃地区处于马厂文化，在马厂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只有 3 件。那么新疆较早进入了青铜时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递，早期新疆地区的文化向四周传播，往东传入了河西地区，地处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与新疆哈密的林雅文化所出土的铜器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

起源于新疆东部的青铜文化向东传播为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再由齐家文化向四周传播，向北传播到达了鄂尔多斯地区，形成的朱开沟文化具有明显的齐家文化因素，此后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

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不断汲取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进行再设计、再整合，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不断交融、变化、发展、创新形成了特有的青铜文化特色并夹杂着来自新疆、河西地区的特征。在甘肃博物馆陈列的青铜权杖头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有彩陶权杖头、玉、石权杖头，还有合范铸造的四角羊首青铜权杖头。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和铜齿轮形器，关于铜铃形器是作为早期萨满教的道具，在哈密及西北地区都有出土过。

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环首青铜刀，最早也在河西地区、甘肃、青海、宁夏出土过，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中华第一刀”便是最好的见证，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一把青铜刀，距今 5000 年左右。

二里头三、四期文化遗址发掘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牌饰、带銚孔的铜器等都具有典型的西北文化的特征。所以，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突然兴起，到底有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新疆、甘肃等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否影响了

①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中原文物, 2012, (04): 51-57.

② 崔勇. 中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辨证[J]. 黑龙江史志, 2014, (05): 41-42

③ 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中原文物, 2012, (04): 51-57.

周边的地区，值得深思。无论是甘肃地区的青铜器还是整个中华大地上的青铜器起源，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借鉴发展的，主题上呈现一个不断向东传播的过程。

2.3 独特的密须国青铜文化

2.3.1 密须古国

据 1935 年《灵台县志》记载，“密须国故城址在县西五十里，即今之百里阵地。”

灵台密须古国，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处甘肃、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处。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灵台密须古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的西周时期，但具体何时立国，文献不足证。

在《辞海》中解释为：“密，古国名，（1）亦作密须，姁姓，在今甘肃灵台西南，为周文王所灭，（2）姬姓，在今河南密县东南”。^①所谓姁姓改姬姓，是由于两个密国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混淆了两个密国而造成的。据史书记载，密国与周多次发生战争，后臣服于周文王成为属地。建立西周后，改称密须国^②。公元前 771 年，犬戎入侵西周，西周灭亡后，灵台密须古国成为犬戎的领地。战国时期，灵台密须古国成为秦、赵、魏、楚等大国争夺的对象。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外交手段，灵台密须古国最终被秦国所统一。秦国统一六国后，灵台密须古国成为秦朝的边塞重镇。公元前 206 年，灵台密须古国被汉朝所接管，成为汉朝西北边疆的重要防线。

正是因为密国为周文王伐灭密须后封为同姓封国，所以密须地区的社会生产活动与生产方式建立在被灭的密须之上，密须国的政治制度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实行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为后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灵台密须古国的社会制度以部落集体生活为主，实行平均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有助于保持部落内部和谐，增强部落凝聚力。畜养大量的牛和马，拥有很好的畜牧业做基础。灵台密须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当时的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周时期陇东地区诸多方国中势力较大的当属密须国，其兴盛存亡反映了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辞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② 李仲立, 刘得祯. 密须国初探[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04): 101-105.

中央王朝权利转换的史影，密须国域是关陇地区的交通枢纽，是西周王朝西北方的要冲门户，因此王室曾封高级军事贵族长期驻扎于此镇守一方。^①原密须地境即今甘肃灵台内出土的大量西周遗物，印证了这一地区在当时的战略地位。^②

陇东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华夷分界线，战乱频繁，密国刚好处在咽喉要道之上，成为西土方国中最有势力的，北接西北戎狄，镇抚周边异族邦伯，对边境进行强有力的防御。直至末代，密国割裂，戎狄入侵，西周王朝在泾河失去了有效统治，衰亡速度因此加快。^③

1967年与1972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灵台白草坡清理了九座西周早期墓葬，被断为康王之前的墓地，出土铜器、玉器各类文物一千多件，墓主当属密须国重臣。1972年至1973年，灵台十字公社姚家河、百里公社洞山、独店公社西岭等地发掘了七座西周墓。1975年在百里公社寺沟大队清理小型西周墓葬M1，出土各类文物六十余件，年代都在康王和穆王之间。^④出土的大鼎形制、纹饰与大盂鼎相似，墓的形制、葬俗都与岐山、凤翔出土的西周早期墓别无二致。从出土的红陶罐和高领分档鬲等器物来看，都说明密须国在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早就受到周人的影响。文王为灭商做准备，讨伐密须，巩固后防。^⑤

2.3.2 密须国青铜器特征

灵台密须国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丰富，包括武器、生活器皿、礼器等，展现出西周西部地区的生活面貌和工艺技术水平。灵台密须古国的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种：武器类：青铜戟、戈、剑、斧、镞等。青铜戟是戈与剑的结合，可勾可砍可刺；青铜斧刃部锋利，柄呈弧形，便于持握；青铜镞适合于远程攻击。生活器皿类：青铜盃、罍、尊、觶、觚等。青铜盃主要用于盛水或调酒；青铜尊、觶用于饮酒。礼器类：青铜鼎、簋、爵等。青铜鼎为礼器之首，主用于宴享、祭祀、随葬；青铜觚、爵为饮酒礼器，用于宴请宾客。这些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显示出灵台密须古国社会礼仪制度的严谨和规范。

① 邓芳. 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人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22.

② 祝中熹. 密须史事考述, 古史钩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308—309.

③ 姜俊华. 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J]. 丝绸之路, 2020, (03): 67-71.

④ 马林伟. 关于密须国的几点认识[J]. 才智, 2014, (03): 257.

⑤ 李仲立, 刘得祯. 密须国初探[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04): 101-105.

灵台密须古国的青铜文化特点有三个方面：

（1）精美的工艺

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多采用模范法，经多次浇灌、冷却，形成器物的内外壁。表面装饰采用雕刻、镶嵌、铸造等多种技法，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纹饰。这些纹饰通常与宗教、神话、历史、战争等有关。例如，一些青铜器上饰有动物形象，如龙、虎、鸟等。还有一些青铜器上饰有人物形象，如国王、战士、神祇等，通常与灵台密须古国的政治、宗教、文化等有关，这些精美的工艺为后世青铜器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独特的艺术设计风格

灵台密须古国的青铜器艺术设计风格独特，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青铜器的纹饰以动物纹、几何纹和人物纹为主，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动感。例如兵器上出现的犀牛造型，猓人造型以及牛首、羊首的造型，这些精美的造型和纹饰需要经过精细的雕刻和镶嵌，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

（3）丰富的文化内涵

灵台密须古国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和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例如，一些青铜器上饰有动物形象，可能与灵台密须古国的自然崇拜有关；人物形象可能与灵台密须古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有关。此外，灵台密须古国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和特点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和审美观念，以及对纹饰、图案、镶嵌等美学的追求。

3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遗存与发现

3.1 青铜器的遗存与发现

1967年的9月，一座坍塌的西周墓葬(M1)在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队平整田地时发现，^①随后，文物考古发掘专家于1972年10月继续在M1、G1附近地区发掘出8座西周墓葬。位于白草坡村两道沟壑之间的土山咀中部梯田里，出土文物一千八百多件，青铜器数量达三百多件，其中27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素有“青

^①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铜王国”之称。^①现存九座西周墓和一座车马坑相距约 60 米，分南、北两个区域。北山开阔平缓，由南向北排列 7 座：M3-M9，与南侧并列的是 M3-M5，^②M6、M7 处中游水平，以北为 M8、M9。M6 和 M9 号为两个小墓葬，旁边分别坐落于 M7、M8。南区地形陡峭，发掘 M1、M2 和车马坑一座，M1、M2 相距 17 米，车马坑居其中。^③

这批墓葬，除 M2、M9 保存完好外，余均遭早期盗掘（M3-M8）或自然破坏（M1、G1）。在所有出土的随葬品中，M1、M2 占绝大多数，其中铜器类，也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青铜器纹饰特征大多出土于此墓，铜器类主要分为酒器、食器、兵器、车马饰器种。其中酒食器类有三十四件，铜鼎九件，铜甗两件，铜簋五件，铜尊三件，铜卣五件，铜觶、铜爵、铜盃铜斗各两件，铜角、铜罍各一件。^④

这批 M1、M2 出土的酒食器雕铸工艺极为精湛，质地优纯，范模准确，纹饰精致，具有特别典型的西周代表性的器型和纹饰，每一件设计都有其独到之处。

另外还有出土的兵器三百余件，有戈、啄锤、钺、戟、剑等九种。其中戈出土最多有五十七件，啄锤、钺各一件，戟、弓秘各两件，短剑四件，箭矢二百二十七件，胄泡六枚、盾泡两枚。车马器有车饰和马饰两种，铜车辖、铜车轸四件，铜釜铃十三件，铜軛足饰一件。M2 出土的马饰数量庞大达四百多件，兽面饰两件，各种装饰铜泡三百多件，当卢九件，还有其他的 U 形器、管状器、牛头饰 10 件。除此之外，另外出土的还有陶瓷类、玉石、蚌贝、甲骨类。

它们的出土在当时社会出土西周青铜器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这批青铜器便作为西周青铜器的一批标准器作为横向比较，用于鉴定文物方面的研究，在三千多年前的甘肃，究竟是谁可以具有如此高规格的随葬器物，墓主人又和当时的周王朝有着怎样的联系，关于在 M2 墓中，随葬品呈现出分层的葬俗，为我们还原出墓主人生前奢侈、享受特权的生活，这为我们剖析西周的礼制、宗法制提供了一个实例物证。^⑤M2 中的第一层摆放酒器和食器，在《周礼》中为祭器、宗器同出的贝器、玉贝和酒器在殷周礼制仪式中往往并用。据《礼记》等记载，这些贵重的玉贝、器皿，体现严明的等级、分封、宗法制度。

①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②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③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④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⑤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 1977. 10-15.

第二层环绕式的兵器，代表维护墓主人的卫士。^①

第三层与《仪礼·既夕》：“用器，弓矢、耜……；役器，甲冑、千（盾）、笮（箭囊）”等葬仪相符。头顶有盔，腹部覆盾，备弓箭、刀剑、銮铃、髻勒等，构成军事贵族拥有的全副武装披挂和车马仪仗。

第四层，即《周礼·小宰》所谓“丧荒，受其含、椁、币、玉之事”，各种玉器是体现奴隶主“受命于天”思想的“瑞信”，海贝则是重要的货币财富。^②

M2 反映的葬礼，与某些西周礼制实况也十分相似。祭器、兵器、车马、玉贝集中体现了奴隶主的特权、暴力、奢侈生活和反动思想，生前占有享乐，死后埋入坟墓，以便在幽冥中继续使用，是奴隶主阶级在 M2 葬礼上的表现。^③

而面积最大的 M7 因被人盗掘，其中的文物所剩无几，令人斐然的是，M1 中出土了七件青铜鼎，其形制大小不一，据资料考证，西周的用鼎制度在西周中期以后成熟，可以用七鼎随葬的无一不是身份显赫的贵族。

3.2 灵台白草坡卩爰伯与灋伯

殷末周初，方国、异族分布于此，戎狄之邦、殷之盟邦甚多，《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文王三年伐密须，后筑稳固后方，以利迁都、东进，灵台地区出土大量西周墓葬：百里洞山、寺沟、郑家洼，什字的姚家河等处。^④从侧面说明密国统治范围内有很多贵族或封地，其中 M1 和 M2 墓的主人卩爰伯和灋伯便是其中一员。

M1 和 M2 的墓葬年代，正是周初大规模与鬼方交战之时。^⑤在岐山出土的大盂鼎对此有所记述，盂是康王的重臣，其封地就在岐山，目的就是为了与鬼方作战，可见当时的岐山在灵台地区的重要性。^⑥

而灋、卩爰二地，是泾水各个诸侯国通向宗周的咽喉要道（如图 3.1）所示，是北方民族出入的要冲之地，灋、卩爰的命名也包含了统治蛮方的意思，“伯”

①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10-15.

②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10-15.

③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10-15.

④ 祝中熹. 密须史事考述, 古史钩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308—309.

⑤ 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10-15.

⑥ 张利军. 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20.

代表两层含义：一是代表“伯仲叔季”中的排行，二是代表“公伯子男”中的爵位，用来表明等级身份，陪葬品中的人头戟、虎钺、玉人等大量的豪华葬品，足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西周初年，周王向愿意归附的殷商贵族妥协，以达到控制殷商势力和周边放过的目的，怀柔政策、达济天下的结果就是大批旧贵族连同氏族奴隶被分散在各地。

根据铭文研究，“伯”多半是作战将领，随分封而调动，他们随周王朝或高一级诸侯节制，在自己的封地拥握重兵特权，各镇一方，参与多次重大战争，维护着国家的专制传统，是古代奴隶制国家的主要专政工具，从而得到了周王的优厚待遇。而专家学者们翻阅古籍，并没有找到有关于灋伯、𠄎爱伯的相关记载，其封地也未可知，但考古队根据古黑水的位置，推断出灋伯就封于黑水，也就是现在的达溪河流域附近，按当时以地为姓的习惯，这位贵族因黑水而得名“灋伯”。而𠄎爱伯封地缺乏线索，无法准确推断其地理位置，但应该与黑水相距不远。三千年的沧海桑田，这些青铜礼器和杀人利器曾经的精雕细琢和凛冽寒光已经化作斑驳的锈迹遍布全身，这一件件青铜艺术珍品，依然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战场上的生死搏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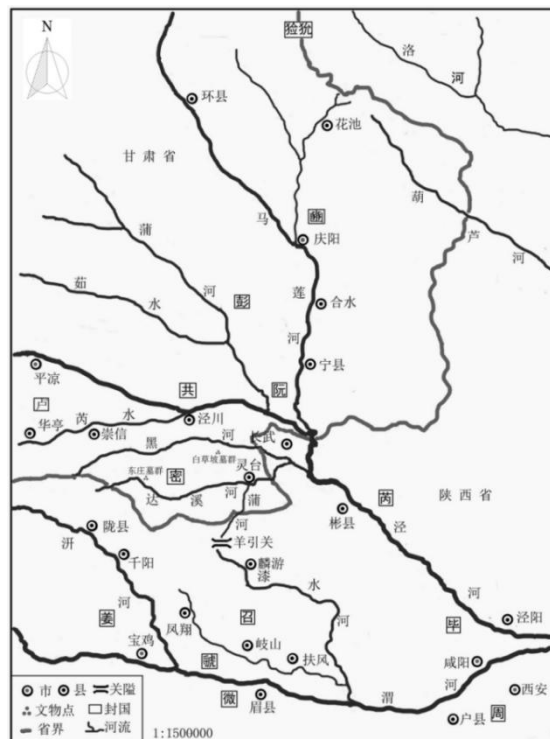


图 3.1 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①

① 姜俊华. 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J]. 丝绸之路, 2020, (03): 67-71.

4 甘肃灵台白草坡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

4.1 青铜器不同造型分类特征

4.1.1 酒器类

酒器类有青铜盃、斝、卣、尊、爵、觥等。

张长寿在《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一文中曾指出“可以设想，铜盃在器形设计来源于陶盃，开始出现于殷商早期，其延续的时间则较长，在陶盃这种器形被淘汰之后，铜盖继续沿用，至殷商晚期更发展为方盃。”^①1986年出偃师二里头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年代的青铜盃（如图4.1）有盖，三尖锥足，管状流位于顶部，封顶。^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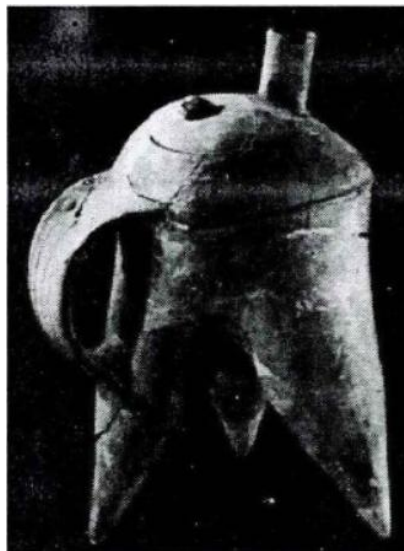


图 4.1 偃师二里头陶盃^③

《观堂集林·说盃》中亦指出“盖见于宋人书中为最早，欧阳公《集古录》已著录一器，其铭曰‘伯玉殷子作宝盖’……自宋以后，知其为器名。”^④自北宋出现至今，人们对于青铜盃的功能用途存在诸多争议，有食器说、酒器说、水器说、酒器兼水器说。《说文·皿部》“盃，调味也，从皿禾声。”宋人多认

① 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276页。

② 线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该盃出土情况尚未见正式报告，《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5页。

③ 李云朋. 商周青铜盃整理与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④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盃》卷三，中华书局年。

为盃是一种酒器。王国维所著《说盃》一文中根据端氏所藏殷时铜禁上所列诸酒器中杂有一铜盃，以为酒器，指出盃“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也。”人们就可根据自己酒量来调节浓淡，使人既成礼又不为酒所苦。郭宝钧先生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指出“盖”是古时和酒温酒的器。有腹用盛，有口用受，有咏用注，有霁用执，有足用立，且备受火，其形合其用。^①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把盖附盃归为水器，并从墓葬出土成组的青铜礼器之组合关系与出土情况分析、盃与匝的自名互称等方面进行了论证。^②

综上考虑，对于盃的用途，更具其外观的设计，管流的造型位置，盃的设计，应该是一种用来盛放液体的器具。根据以往对于青铜盃的研究，对于盃的类型划分有两种：一是以足来划分：三足盃、四足盃、异形盃、圈足盃；二是以腹部为划分，张亚初《对商周青铜盃的综合研究》^③将商周青铜盃分：鬲形盃、鬲形盃、壶形盃、罐形盃。

而青铜盃的造型设计与其他器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有一个管状流，其或长也或短，分为甲类：管状流位于盃顶部；乙类：管状流位于盃腹部。根据其分布广泛特点，大致分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北方地区、巴蜀地区、西北地区、岭南地区八处。其中西北地区主要指甘肃平凉、庆阳、陇南地区，这一地区青铜盃出土量少仅有6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盃主要出土于平凉、灵台，灵台白草坡M1、M2出土的青铜盃为乙类，跟关中地区主流的形制相似。关中地区是西周王朝的京王畿地区，出土数量可观，纹饰以饕餮纹、蕉叶纹、云雷纹为主。

(1) “父辛青铜盃”（如图4.2）甘肃灵台白草坡F 爰伯墓中出土，高度有28.5厘米。

腹部有三组两道三角形的折线纹，以及盃嘴部分也刻有两道三角形的折线纹。其腹部的折线纹是装饰在鼓腹的鬲形上，圆润的形制上两条富有韵律感的几何线条增添了一丝审美趣味。盃嘴处的三角折线纹与云纹的结合，优美与挺阔感十足。耳内有阴刻器盖和器身颈部有纹饰带，分别以回纹为地，回纹上铸有兽面纹，微凸起的扉棱两旁为凸起的兽眼。

其造型属于乙类，分器盖和器身两部分，整体呈现鬲形状，其腹器盖上有圆

①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151。

② 李云朋. 商周青铜盃整理与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③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形钮环，器身把手上有一牛首鑿，鑿上也有一钮环，两个钮环相连接，方便酒器的使用。牛首鑿形制圆润，圆圆的牛眼，突出的牛嘴和外立的双耳，十字纹表现耳内轮廓。形象精简但又不失韵味。下方把手上饰有阴刻云纹，把手下方的器身上刻有铭文“𠄎 爰伯作”。



图 4.2 甘肃灵台白草坡父辛青铜盃^①



图 4.3 甘肃灵台白草坡徙遽广僕青铜盃。^②



图 4.4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盃^③

(2) “徙遽广僕青铜盃”（如图 4.3）：高 22 厘米，口径 12 厘米。

通体纹饰，主次分明，颈、腹部以云雷纹为地，柿腹四棱处饰巨目兽面纹，

① 铜盃，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http://www.gansumuseum.com/dc/show-614.html>

② 徙遽广僕 铜盃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③ 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用文物讲述黄河流域青铜文明. <https://weibo.com/1704131137/ND8GPab2A>

四足则布蝉纹。器盖上布满纹饰，不同方向的云纹、回纹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侧面是以云纹、回纹为地的兽面纹，凸起的乳钉作兽的眼睛和鼻子，眼睛两旁有像耳朵形状的纹饰，下方有凸起的粗线条作为兽的嘴巴。颈部有一条环带纹，内饰云纹。器腹部分呈现三组兽面纹，凸起的乳钉为兽的巨目，装饰组合与器盖相一致。底部四驻足，足上饰两道弦纹，弦纹中间饰云雷纹，下方环绕三角形折线纹。此物运用了多种纹饰的结合，来自中原文化的弦纹、云雷纹、回纹，又有来自游牧民族的兽首做装饰。几何纹饰是西周青铜器纹饰的一种重要类型。

几何纹饰主要包括线条、圆形、方形、云纹、雷纹、羽翼纹等，它们简洁、抽象，具有较强的装饰性。这种纹饰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独特理解，即以简单、纯粹的线条和形状表达出丰富的审美感受。同时，在器物表面上饰几何纹饰也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往往代表着天、地、人三界的和谐统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谐、宇宙和谐的向往和追求。造型：形浑厚庄重，纹饰繁缛富丽，是西周早期盛行的式样之一。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盃》云：“盃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①酒从尊中取出，要先经过盃中经过调水过程后，方能注入爵中饮用。^②柿形腹，盖部有圆环用来连接器身上的把手，把手顶部铸一兽首盃，眼睛突出，眼轮廓立体深邃，嘴巴张开成盃含住把手，形象惟妙惟肖。无论是整体造型的设计还是纹饰的设计，都离不开“酒”的象征意义，更离不开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内在联系。

盖内铭文两行六字：“徙遽广僕作父己”“徙遽”意为快速传递。研究发现，早在商代时就已经建立了驿传系统，当时中央王朝在主要交通道路上都专设驿站类机构，专为宣达王命和传递军政信息。“徙遽”是专门执掌驿递事务的长官。此青铜盃系徙遽为其名为“己”的父亲所作的祭器，被视作我国古代驿传制度最早的见证。

(3)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盃(如图 4.4)，器身口径 11.8 厘米，宽 24.4 厘米、通高 27 厘米。

器型与灵台白草坡类似，为椭方覆钵形，顶面有双兽首桥形钮，一侧有桥形鼻钮。盖面周边饰有一圈鸟纹，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饰有四只鸟，每两只为一组，鸟首之间以花瓣形扁扉棱分隔，鸟的形象惟妙惟肖，上喙长，下喙短，上

①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② 西周龙首纽直流盃. 古人的“奢华”调酒器 方偲, 合肥日报, 2014-08-29.

喙包着下喙，冠羽向后延伸，身、冠之间饰“S”纹，以云雷纹为地。^①

中原地区包括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关中地区是西周王室的凉畿重地，中原地区、关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出土青铜盃主要的三大区域，山西运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从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盃造型、纹饰来看，很大程度受到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

而在1974年出土于广东信宜县松香厂工地的青铜盃是本地仿制的中原型铜器，添加了土著越族元素，通高26.2厘米，口径14.2厘米，形制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的主流铜盖形制相似，刘彬徽先生认为这两件盖器型为楚式，纹饰也基本具楚风，但也杂有越风，是越地仿铸之楚式器。^②广东地处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相通，这件青铜盃纹饰繁缛，盃身似鬲，口沿外侈，流较长，三足分裆；颈中部饰一周夔纹，肩上有一条斜角雷纹；腹部以裆为界，每足都由雷纹构成一组饕餮纹，两组饕餮纹之间各夔龙一条。盖和流上饰龙纹，龙头是立体的，烧制得稚拙而生动。

与灵台白草坡青铜盃最明显的设计区别在于：盃手由两条镂空的夔龙相合而成，两夔龙之间有小圆柱相连，上部的小圆柱与盃身特铸的一条小龙的口相连构成盃手，这种构造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岭南地区的越人们仰慕中原文化，在庆典场合使用，用闭埋藏，秘不示人。整体器型更加轻薄，通体饰立体纹饰，看起来精美繁缛，不同于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盃，盖部和颈部饰花纹或者通体饰暗纹，更加注重器物本身的肌理感和轮廓感，腹部光泽的地方用几何折线纹装饰，虚实结合的审美文化。在造型方面，岭南地区多用龙纹、饕餮纹，盃部也采用浮雕式夔龙纹，而西北地区多采用牛首盃、羊首盃，这与当地的畜牧业是分不开的，体现出草原游牧风格。从造型和纹饰两方面揭示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及审美差异之处。

青铜卣是一种中国古代盛酒的器皿，口沿为椭圆形，足部呈圈形，有盖和提梁，腹部有圆形、椭圆形、方形等。^③常见于商朝和西周时期，古文献和铜器铭文常有“秬鬯（jù chàng）一卣”的话。

① 谢尧亭, 嵇孝文, 范文谦等.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M2158 发掘简报[J]. 考古, 2019, (01): 15-59+2.

② 刘彬徽《两广先秦青铜器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1期, 124.

③ 查飞能. 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D]. 西南大学, 2019.

(4) “青铜提梁卣”(如图 4.5): 高 32.4 厘米, 宽 20.7 厘米。

这件提梁卣的器盖部分装饰有一组弦纹, 器身之上装饰有两组弦纹, 弦纹中夹杂有对凤纹。凤首昂扬, 圆目钩喙, 华冠后曲, 与翘拂的翎翼相呼应, 长长的尾巴双分开来, 向后拖又长长向上卷起, 与凤躯相配构成极为丰富的流动感长带, 简洁有力地表现出凤的优美身姿。从正面看到, 上方的对凤纹中间, 有一个兽面纹饰的高浮雕, 眼睛凸出, 头骨挺阔, 有两个大角向外延伸, 刚好与凤纹相连接。同样牛角上面也有阴刻纹饰, 牛的面部饰有阴刻的线条, 体现出牛角上的肌理感。提梁卣以其鲜明的器型特征, 受到人们的追捧赞赏。

卣是商周贵族们祭祀、宴饮时用来盛酒的一种器具, 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有用桦树皮卷成桶状容器的习俗, 筒形提梁卣就是对桦树皮筒的模仿。^①器身的两侧有两个牛首鋈, 这也是非常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兽首立体浮雕, 牛首微微向下, 两角向上, 刻画出鼻子, 嘴巴微张, 眼睛炯炯有神, 盖内及腹的底部皆有铭文“卣 爰伯作宝尊彝”。

这件器物共出土一对, 一大一小相配, 而在附近的溧伯墓中, 同样也出土了大小相同的一对提梁卣, 两端铸羊首, 纹饰带为对夔纹, 铭文为“溧伯作宝尊彝”。(如图 4.6) 夔纹和弦纹都是典型的中原青铜文化的纹饰, 而此圆筒形式的形制, 又是典型的游牧文化的独特风采, 无论是羊首还是牛首, 都体现当时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反映了民族间密切交流的生动印记, 尤其增加了这件珍贵文物的历史价值。从形制和纹饰两方面体现甘肃灵台地区的青铜器不仅受到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还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熏陶。

^① 阳飏. 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里的青铜王国[N]. 甘肃日报, 2016-07-26(009).



图 4.5 甘肃灵台白草坡爱伯青铜牛首提梁卣^①



图 4.6 甘肃灵台白草坡溧伯青铜羊首提梁卣^②

关于青铜提梁卣在全国出土情况来看，数量相较于其他青铜器物较少，作者在查阅大量的资料中发现，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这两件青铜提梁卣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造型与纹饰的设计。

在宝鸡、湖南、江西出土的提梁卣造型多为深腹形壶形卣，上小下大，口椭圆形，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 1974 年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 M1 出土提梁卣。^③1977 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提梁卣。^④还有湖南博物馆馆藏的 1996

① 作者拍摄

② 溧伯铜提梁卣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③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1 卷，文物出版社，1996 年，图版一三七

④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1 卷，文物出版社，1996 年，图版一三八

年宁乡滩山金塘组出土金塘卣。^①1986年3月,湖南省湘潭县荆州乡出土的86金棋卣,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②198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35.5、口径28、胎厚0.2厘米。^③

而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这两对提梁卣造型则是筒状,上下大小一致,这便是仿照用桦树皮卷成桶状容器的方法,筒形提梁卣就是对桦树皮筒的模仿,其造型设计结合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饮酒的器具的造型特点而形成的独特筒式提梁卣。

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器物呈扁条式提梁,宽度大约2厘米。其他地区的提梁形制有绳索状提梁、索状提梁、扁平提梁上有浮雕纹饰、绲索状等。另外还有提梁两端的兽首造型,根据湖南地区出土的部分青铜卣来进行分析,提梁卣是湖南商到西周时期提梁卣是湖南商到西周时期青铜器中有确切出土地点、数量最多的器类,宁乡一地发现5件,全省共发现9件。分为中原式卣和越式卣,^④其中中原式卣分盖侧有翼角的卣和盖侧无翼角的卣。1996年7月11日,出土于宁乡县出土的96金塘卣,^⑤1971年浏阳秀山乡保塘村出土的71保塘卣,^⑥1995年8月,涟源市桥头河镇水洞村出土的95水洞卣,它们的提梁两端分别是龙首、上翘的翼角和兽首,^⑦1986年3月,湖南省湘潭县荆州乡出土越式86金棋卣,提梁两端各一冠状龙首。^⑧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M1出土提梁卣,^⑨两端作蛇首形。

而甘肃灵台白草坪出土的青铜提梁卣,两端分别为羊首和牛首,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龙首、蛇首等兽类的装饰造型,羊首和牛首的出现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体现游牧民族风格。而出现类似的情况便是宝鸡出土的提梁卣,2012年6月,宝鸡市渭滨区鼓镇石嘴头村发现三个古墓葬,其中六个提梁卣最为精美。单父乙卣:卣体为椭圆形,带状提梁两端是兽纹,盖两侧有对称的双耳,牛角状,

① 李乔生:《湖南宁乡县横市镇出土一件商代提梁卣》,《考古》1999年第11期

② 熊建华. 湖南出土青铜壶形提梁卣的梳理与断代分析[J].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2014, (00): 112-122.

③ 熊建华:《湘潭县出土周代青铜提梁卣》,载《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岳麓书社,1987年.

④ 熊建华. 湖南出土青铜壶形提梁卣的梳理与断代分析[J].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2014, (00): 112-122.

⑤ 李乔生:《湖南宁乡县横市镇出土一件商代提梁卣》,《考古》1999年第11期

⑥ 湖南省博物馆:《新邵、浏阳、株洲、资兴出土商周青铜器》,载《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

⑦ 戴小波:《涟源市出土一件商代铜卣》,《文物》1996年第4期

⑧ 熊建华:《湘潭县出土周代青铜提梁卣》,载《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岳麓书社,1987年

⑨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一三七。

提梁两侧饰高浮雕牛首、牛耳。牛首。羊首的出现说明甘肃地区与陕西地区均受到来自草原游牧风格的影响。

(5) 同样有着对凤纹装饰的便是“β 爰伯青铜尊”(如图 4.7), 这件尊敞口高体, 呈圆形, 高 25.3 厘米, 口径 19.3 厘米, 底径 13.5 厘米。

以两条凸起的弦纹为界, 分别在颈、腹、足之间, 腹部上下各有一周左右的纹饰带。^①此弦纹、纹饰带与器身上的对凤纹结合, 起到间隔的作用。凤首微微向上, 双目圆突, 长喙, 冠羽向后大幅度拂卷, 呈钩状, 尾部长长的羽翎大幅度展出后向上卷曲。其特别之处在于: 对凤纹饰带在青铜器中多用在铜器上作为辅助性装饰, 置于器物的颈下、腹上或者圈足部位。^②早期的时候偶尔做主题纹饰, 所以此尊仅此一例, 这种分体式的长尾凤鸟的形象,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③

尾部的设计深受商代夔纹的影响, 此后逐渐向窃曲纹图案演变, 西周后期流行凤鸟窃曲纹。周王朝共传国君 32 代共 37 王, 治世长达 791 年, 一直以“凤凰”作为精神的崇拜, 同时辅以“凤”文化的深化挖掘和传播, “凤凰”成为美丽、吉祥、善良、宁静、有德和自然的文化承载, 从朝廷到民间以有“凤凰”之精神而自居, 不管是服饰图案还是建筑雕塑都显化“凤凰”的身影, 追求“凤凰”的德性作为最高的精神追求, 周朝是“凤凰”文化快速发展和兴盛的巅峰时期。此尊上的对称性装饰带, 图案简约, 用线条铸刻出动物的体型特征, 受到中原周文化的影响。其次, 动物纹饰是西周青铜器纹饰的另一种重要类型。动物纹饰主要包括龙、凤、鸟、兽等, 它们形象生动, 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这种纹饰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动物纹饰往往与宗教信仰相结合, 象征着神灵的力量和保护, 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和敬畏。

造型铜尊为侈口, 鼓腹状是为了增大容量, 敞口是为了取酒方便, 足外侈。整个器体粗硕, 颈、腹、足部界限分明。

① 祝中熹. 敞口尊饰对凤纹, 《甘肃日报》, 2004. 02. 13.

② 祝中熹. 敞口尊饰对凤纹, 《甘肃日报》, 2004. 02. 13.

③ 祝中熹. 敞口尊饰对凤纹, 《甘肃日报》, 2004. 02. 13.



图 4.7 甘肃灵台白草坡 爱伯青铜尊^①

(6) “父丁青铜角”（如图 4.8）：这件青铜角器高 23 厘米，角距 8.5 厘米。

器身的颈、腹也由这种勾云纹组成兽面，同样用细密的云雷纹作地衬。三支三棱形实心高足，略外撇，饰有阴刻蝉纹。青铜角的形状和爵很相像，区别就在于：爵口的前端为流，后端为尖尾，对称为鸟的双翼。爵大都在近流处有菌状的双柱，角则没有，角大多有盖，而爵没有。爵和角的用途相近而又别，爵为饮酒兼温酒，角则主要用来温酒，因有盖无流，不便于口饮。深圆腹，圜底，扁弧形口，口部分翼，两端扬起，翼尾呈锐角。棱脊盖，盖沿与凹弧口吻合，盖正中一个半环形鼻纽。盖面饰有勾云纹，纹中点缀有以纽为对称中心的四只兽目，隐含兽面的寓意。

角釜内刻有徽记。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正处于商时期的密须国内，所以出土了包括角在内的商器。此墓出土的大多数商器都有族徽，根据族徽的多样性从而得知，他们可能是周人灭商后的战利品，周王朝再给贵族们分封爵位时当作赏赐品赐予当地的军事将领。

(7) “伯作铜爵”（如图 4.9）：这件铜爵高 22.4 厘米，宽 17.4 厘米。

“伯作”爵：爵通常指贵族的等级地位，周代实行宗法制度，《说文解字》中：“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

^① 爱伯铜尊.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其鸣节节足足也。”^①爵同雀，将酒杯做成鸟雀的样子，取其叫声“节节足足”，以诫饮酒者不要过量。流、尾下的腹中部起一条竖扉棱，以扉棱为鼻脊饰两组对称的大凸目兽面纹，形成一周宽装饰带。^②从实用角度来讲，饮器本可以做得简单轻巧，但为何要设计出阔流尖尾、流仰尾翘、略高于尾端的如此复杂的造型？下面是实心足的三棱刀形，呈拱形。扁带式的拱形鍪，鍪上突饰牛首，牛首阔嘴巨目，两角上弯。对于爵上的立柱，马承源先生提出的观点：认为柱是用来固定过滤的网罩的，古代时候的酒还是糟浑置的黄酒，用于祭祀时还需将捣碎的香草添入后煮汁，即谓“鬯酒”。在“清酒”时就要用滤网将杂质过滤。这便是古人饮酒时巧妙地设计。

鍪内腹壁上铸铭文“伯作”。根据爵的考古发掘，商代是爵的全盛时期，高级贵族墓中爵的出土量极为可观，有人认为上层社会大量酗酒也是导致商灭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故而倡导喝酒要有所节制。随着周朝兴盛，爵等一系列酒器也随之减少甚至绝迹。



图 4.8 甘肃灵台白草坡父丁铜角^③



图 4.9 甘肃灵台白草坡伯作铜爵^④

4.1.2 食器类

商代后期，以今陕西周原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周人日益强盛，周边很多方国纷纷依周为宗主，但只有今灵台县区域内的密须国不买周人的账，《诗·大雅·皇

①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② 毕经纬. 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③ 伯作铜爵.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④ 父丁铜角.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矣》中“密人不恭，敢距大邦”。^①由此而言，周人要广拓国势，巩固后方，扫清伐商的障碍，征伐密须国首当其冲，到了周文王后期，密须国被灭，派王室重臣去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而鼎作为青铜时代的典型代表，更多是象征君侯名分、地位、权利。^②青铜鼎由腹、足、耳三部分构成，腹可以盛物和烹调，足可以扬火，耳部可以用来穿抬搬运。鼎的类型有很多，总分为方鼎和圆鼎两大类，方鼎的品位高于圆鼎，如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鼎多达 32 件，方鼎 4 件。

(1) 灵台洞山村出土的“青铜大鼎”(如图 4.10)，高有 60 厘米，口径有 50 厘米。

此鼎的立耳大而宽厚，三足略显蹄意，尽显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将动物形体的元素融入进器物形制中，鼎身浑厚庄重，气势恢宏，纹饰瑰异华贵，尚含神秘意蕴。腹部上有等分鼎周的六条五齿扉棱，以扉棱为鼻脊，饰六组兽面纹，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地，主纹上又有勾连纹，形成当时贵重青铜器上的三层花。足上有扉棱为鼻翼各饰兽面纹一组，下方装饰两条弦纹。

在器物的内壁上有一个族徽(如图 4.11)，具体表示内容无法证实，学界有几种说法：一是一种家族的族徽，就像现在的 logo。二是甲骨文“周”字的写法。三是从纹样上来看，图案下方像一个几案，上面供奉只一个类似于田地的图案，西周又实行井田制，是一种土地的分封。人类自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鼎的地位迅速提高，鼎最初的功能是盛放肉食，与盛放粮食的簋组成专供天子宴享、祭祀、随葬的礼器。一鼎盛放一种肉食，等级越高身份越尊贵，摆设的鼎也越多，鼎逐渐成为贵族们地位权势的标志。这尊青铜大鼎的形制与大盂鼎、子龙鼎形制大体相似，子龙鼎高 103 厘米，口径 80 厘米，而大盂鼎高 101.9 厘米，体积虽不及这两尊大鼎，但灵台出土的这尊鼎，是甘肃目前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鼎，无论是从器型还是纹饰，不仅可以镇抚四方，体现出周王室对该地区将领的肯定，也充分说明灵台地区在古代重要的战略地位。

^① 葛培岭注译. 诗·大雅[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② 张威媛. 中国青铜鼎造型与纹饰风格的演变[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5, 2(12): 142-145.

图 4.10 甘肃灵台县洞山村青铜大圆鼎^①图 4.11 青铜大圆鼎铭文^②

(2) “铜方鼎”（如图 4.12）：商周时代只有身份较高的贵族墓葬才出现方鼎。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卩爱伯、灋伯两位高级军事将领各出方鼎一对。卩爱伯墓中这对方鼎高 24 厘米，口径横 18 厘米，纵 14 厘米。

器腹的四面满饰牛角大兽面纹，兽面纹的两侧辅衬倒立的夔纹，并且以细雷纹为地。牛角雄浑挺拔，以平展的人字纹分为四节，目突出而中间有凹陷，鼻脊直直隆起直贯头部。整体的形象阴森狰狞，承接了商代遗风。古人认为装饰在祭器上的兽面纹可以发挥特殊的灵异效应。有的兽面纹向左右两侧展开，有的只是以鼻梁为中线的夸张兽面，两两对称，喙目清晰，造型生动。器身下方足部有以扉棱为鼻脊饰小型兽面纹，下辅两周弦纹。直口双立耳，耳上部呈圆角。腹壁上四隅上铸二齿扉棱。四个长柱足，起中突式短扉棱。鼎腹内上的铭文与提梁卣上铭文相同，写作“卩爱伯作宝尊彝”。因西周大多数的鼎都作为食器，故规格都较小。

① 青铜大圆鼎.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② 青铜大圆鼎.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12 甘肃灵台白草坡伯铜方鼎^①图 4.13 甘肃灵台白草坡铜分裆鼎^②

(3) “分裆鼎” (如图 4.13): 白草坡出土的有两件, 一件高 20.5 厘米, 口径 17 厘米。另一件高 26 厘米, 口径 20.7 厘米。

一件腹部满饰云雷纹为地, 上饰兽面纹。一件腹部和足部饰有牛面纹和兽面纹, 云雷纹为地。一件立直耳, 浅腹, 三驻足。另一件口沿近似三角形, 深腹, 有三道折棱。与圆鼎不同的是: 分裆鼎也叫做鬲鼎, 是鬲与鼎的结合, 一种异形鼎, 出土数量极少。

铜簋: 从传统的观念上看, 簋的用途较为单一, 主要盛放黍稷稻粱等食物, 但从后期的考古发现来看, 簋内既可盛放饭食, 也可盛放肉骨、肉糜等。其中以晋陕豫代表的中原地区成为青铜簋发展的核心。西周开始从商代中酒器转而注重食器, 将创造热情都倾注在了青铜簋上, 因此数量激增, 形制也发生变化。从造型角度看, 从最初的圈足环耳簋满足实用需求, 到后来周人将簋的圈足下方加铸方座, 还将装饰手法聚焦在了耳簠上, 以各种动物的角冠来装饰。

(4) “青铜簋”图 4.14: 同样是 爱伯 M2 号墓出土的“伯”铜簋。高 15.2 厘米, 口径 20 厘米。

腹上和圈足各饰兽面纹四组, 以云雷纹为地, 正面中间有凸起的兽面。双耳上部也饰有兽首, 耳上饰云纹。大口, 沿外翻, 深弧壁, 圈足。双耳有珥, 耳作兽形, 属西周早期风格。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 它还是一种

① 伯铜方鼎.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②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礼器，其重要性仅次于鼎，与鼎配合使用，古人用这种器具来区分贵族社会的爵位等级。

(5) “吕姜铜簋”（如图 4.15）：簋高 18.2 厘米，口径 18.1 厘米。

此簋的设计造型呈现西周中期风格，不同于以往商簋的特征：以圆腹瓦垆纹为特点，簋体低矮，器身呈扁鼓形，双兽头耳衔环，腹部上饰有五条瓦垆纹，凹凸有致，底部有三柱状高足，足环与圈足相衔接饰兽面，有点像盘角的羊头，角大幅度向外弯曲。商代多为圆形双耳簋，西周时期数量增多出现四耳簋、三足簋、方座簋等，战国以后逐渐减少。此簋为西周中期的三足双耳簋，造型别致，具有时代特征，腹部立体的瓦垆纹造型独特。

簋内底有四字铭文：“吕姜作簋”“吕姜”表明器主是一位夫人，吕为氏名，姜为姓，姜姓起源于西北地区最古老的最大的部族之一，姜族长期与周族通婚，与周建立了牢固的联盟关系。所以，吕姜簋的器主应该是从吕国嫁到陇东来的，是一件陪嫁品。



图 4.14 甘肃灵台白草坡卩爱伯铜簋^①



图 4.15 甘肃灵台白草坡吕姜铜簋^②

① 卩爱伯铜簋.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② 西周“吕姜”铜簋. 一件陪嫁品扑朔迷离的历史, 西部地理, 甘肃文化产业网 (gansuci.com).

(6) “匀铜甗”（如图 4.16）：高 38 厘米，口径 24 厘米。

颈部有一周由六组纹饰组成的细线兽面纹，上方附着弦纹。兽面纹之上配以牛角，向两侧平直展开，牛角饰有生动的卷云状节纹，兽目呈圆角菱形，目大传神。^①这件尹 爰伯出土青铜甗，外沿立双耳，深腹细腰，上部为甗，下部为分裆鬲，内置一个笄子，三高柱足。此甗的鬲部装饰纹饰与商后期炊器足部惯用的高浮雕大兽面风格完全一致，对于双角的处理，与白草坡出土的其他青铜器纹饰一致。^②

白草坡出土 2 件，另一件为溧伯墓出土，高 37.5 厘米，口径 23.5 厘米。直耳编纹，侈口细腰，三柱足，腰设活算，口下饰细兽纹，组饰牛面纹，整体设计很是简略。

古代人们的主要饭食为稷、黍、稻、麦、菽物种，去壳后蒸煮后食用。甗便是最通行的蒸煮食器，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汉代逐渐被釜类炊器替代。器型规范，图案细致，其设计非常巧妙，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蒸锅”，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所以说，中国“蒸”熟了世界上的第一碗米饭。



图 4.16 甘肃灵台白草坡均铜甗^③

① 兽面悚怖西周.《甘肃日报》，2002.12.06.

② 兽面悚怖西周.《甘肃日报》，2002.12.06.

③ 匀铜甗.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4.1.3 兵器类

短剑是西周时期灵台地区的一种近身攻击或者自卫的武器,这种短剑的外形和纹饰的设计给予处于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汇处的短剑造型以强烈的影响,为以后兴起的北方青铜文化给予铺垫。这一时期的剑普遍较短,多用于防身,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称“服文彩、带利剑”,就是这一风气的真实写照。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步兵兴起,为了提高杀伤力,剑体加长,其成为战车上的刚需兵器。

(1) “镂空鞘青铜短剑”(图 4.17):甘博这件青铜短剑长 24.3 厘米,宽 10.5 厘米。

面饰有夔纹和斜角雷纹。刀鞘的整体造型呈镂空式,中央盘踞着一条蛇,头部呈三角形,蛇身与蔓草缠绕,形成网状镂空造型。整个剑身近似长三角形呈竹叶状,脊背微微隆起,有血槽,扁茎无格。剑柄处的二犀牛反向相背,四蹄外出,与盘让的蛇藤相呼应,增强了大孔镂饰的艺术效果,给人一种灵动平衡之美。鞘罩上有十个呈对称分布的小透孔,正是用来穿系联结用来固定内鞘。从系孔看,此剑应该是垂直挂于腰部。像这样华丽、奇特的鞘罩短剑,国内实属罕见。还有毗邻关陇地区,盛行于春秋战国的古蜀国短剑,都是由西周时期白草坡式短剑演化而来。其中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房山县琉璃河的有鞘短剑(如图 3.18),性质规格与白草坡短剑性质相似,其鞘口为相背而坐的两人,鞘罩饰萼托花蕾的盘绕藤纹。

白草坡短剑上的犀牛显然是外来物种,而北京房山出土的短剑饰以人的形象,因此白草坡出土的短剑装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甘肃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犀牛的形象,也进一步印证了甘肃地区较早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其整体造型又与房山地区大致相似,那么白草坡这件青铜短剑就是本地区的自作兵器。当一种外来文化或外来物种传播而来,当地人民有一个接受过程,将不同的文化、物种进行融合再设计并装饰在自用之器上,显然是受到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件器物整体性质遥相呼应,既存在共同的源脉关系,又显示出各自的文化风格,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物既有中原文化特色,又富有外来文化风格,体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相互碰撞。

图 4.17 镂空鞘青铜短剑^①图 4.18 有鞘短剑^②

戟是我国一种多功能的长柄武器。其形制的设计也很特别，为戈和矛的结合体。《说文·戈部》：“戟，有枝兵也”。“有枝”意思是构造不同的刃锋多向突出，犹如树枝的分叉。商戟发现较少，周代戟的使用较为普遍，类型逐渐

① 头形器青铜戟.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② 西周剑与剑鞘图片. 百度百科. (baidu.com).

多样化。戈长胡三穿，援上有脊棱。在前文介绍提梁钁时， β 爰伯墓出土的也是带有牛首鏃的提梁钁，而灋伯墓则是羊首鏃，二牛为同一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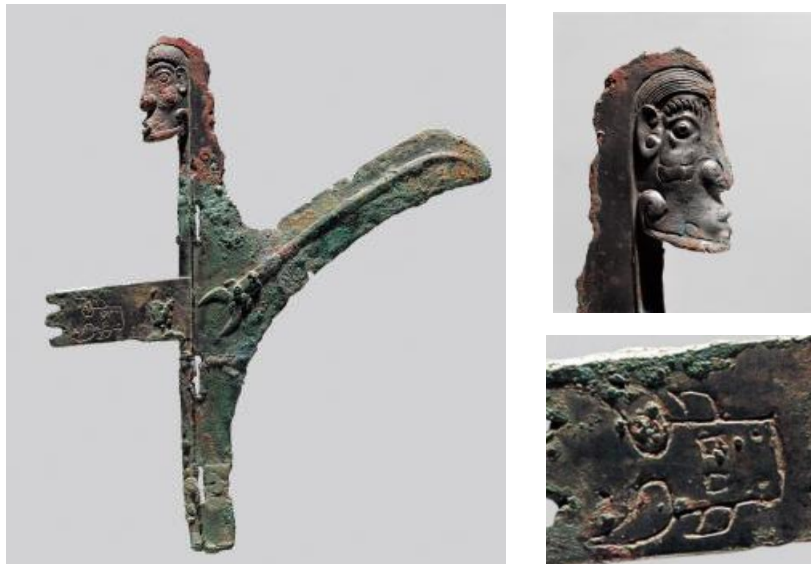


图 4.19 头形鏃青铜戟^①

(2) “头形青铜戟”（如图 4.19）：长 25.5 厘米，宽 23 厘米。

白草坡出土的这件人头形青铜戟，形制设计最有特色。援基部饰有一浮雕牛首，牛口与脊端相连接，首向与脊向呈一条直线，内端三齿，内面阴刻有牛头形的徽识。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常规性戟不同，这件戟呈“十字形”，上部饰有一人头形，人头颈部为一椭圆形浅鏃，人像深目浓眉，大耳巨鼻，披发卷须，嘴唇突出，腮部有线条粗而深的唇形纹饰。根据一系列的样貌分析，这并不是华夏人的相貌，很可能是属于阿尔泰的北方少数民族猗狁人的头部刻画。

云南石寨山滇国墓的人纹钺、吊人矛等，都属于这类战俘形象装饰武器的实例。头像面颊上的类似唇形的图案很可能是显示异域部族的文面之俗，也有可能是胜利者对战俘所施的烙面印记，以防其逃亡。再者，人物纹饰是西周青铜器纹饰的另一种重要类型。人物纹饰主要包括人物形象、人物故事等，它们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戏剧性。这种纹饰类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和记录，

^① 镂空鞘青铜短剑.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反映了当时社会风俗和家族观念。人物纹饰往往与宗法制度相结合，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和地位，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家族观念的重视。

通过考察史籍文献，周初处于国境北部并且构成军事威胁的是狫狫部，周王派邶 爨伯、灋伯在此地主要的任务就是抵御狫狫人的侵略。

这件人头形盃戟很有可能是灋伯所在的统辖范围与鬼方交战时缴获对方首领的战利品。商周时期，方国邻里，各国之间与商周王朝常年征战不休，盛行用异族战俘的肉体献神祭祖殉葬。还有一种说法便是为了彰显灋伯的地位及功勋，参照已斩杀的对方首领的形象制作了这件戟，用此形象来装饰贵族兵器，以炫耀战功、震慑敌人、奋扬君威。^①因此，这件人头形盃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与西北戎狄族群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交融关系。^②

(3) “虎纹铜钺”（如图 4.20）：高 23.1 厘米，宽 15 厘米，刃宽 7 厘米。

此钺大体呈耳形，器身浮雕虎纹，以虎脊为刃，虎头向下弯曲，张口作盃以纳柄。虎纹与钺形浑然一体，着重突出虎的巨口和利爪。虎的凶猛和钺所显示的权威，相互依托，浮雕线条简练有力，生动刻画出虎的形态，整体构思独具匠心，被视为商周铜兵器中的经典之作。

这件耳形虎纹钺，呈片状。而一般的钺呈斧形，弧刃，方肩，有盃极少。^③《尚书·顾命》中提到“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④郑玄注：“钺，大斧。”但商周时期的钺，并非一般的斧，虽是一种兵器，但确不用于实战，而具有权杖形制，象征权势和地位，只有特殊身份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使用。周宣王时代的《虢季子白盘铭》，曰周王“赐用钺，用征蛮方”。^⑤钺为最高统治者具有或所授予的军事指挥权和军法行施权的表示。在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出土的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和西和县宁家庄出土的彩陶权杖头，是最早的权利、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最早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与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商代早期就出现了钺，商代中期开始有纹饰出现，商后期、西周早期出现一些造型和纹饰奇特的异型钺。

① 陶兴华 陈俊德-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本报特约撰稿人 《甘肃日报》- 2020-09-09

② 陶兴华 陈俊德-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 本报特约撰稿人 《甘肃日报》- 2020-09-09

③ 远古石刻的炎帝黄帝“会盟碑”“盟誓台”河南日报；2021-01-26

④ 《春秋》孔丘著. 尚书[M].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4.

⑤ 丝路文化大辞典. 虢季子白盘铭[M]. 兰州:红旗出版社, 1995.



图 4. 20 甘肃灵台白草坡虎纹铜钺^①

1985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出土两件相同的耳形钺，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以龙为饰，龙口作璽，时代晚于白草坡。虎纹也是古代青铜器中重要的纹饰和造型，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虎纹和虎的造型也呈现不同的主题风格。更多地出现在礼器、青铜兵器和车器上等，其功能和含义也从神秘宗教功能向象征功能演变。

殷商青铜器中的虎造型更多地出现在礼器上，特别是以“虎食人”为母题的纹饰，显示出原始宗教的神秘意味。青铜器同样在西周时期发展礼仪制度，纹饰的宗教功能及震慑意义逐渐减弱，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纹也向装饰性能转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铸造的青铜器突破常规礼法，突出地域特色，其中虎的形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由而浪漫的艺术特征。^②

① 虎纹铜钺. 精品赏析,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② 马玉. 礼县早期秦墓葬群金属器动物纹样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20. DOI: 10. 27410/d.



图 4.21 夔纹三穿戈^①

(4) “夔纹三穿戈” (图 4.21): 长 28.4 厘米, 宽 13.9 厘米。

白草坡出土的这件青铜戈, 戈上饰有卷曲形夔纹, 与木柄连接处浮雕一尊弯角的羊头固定。纹饰线条深嵌而又均细。^②夔是我国古代一种传说形如龙确只有一足的动物, 一足的龙形动物并不存在, 而是二足龙侧面构图时的视觉简化。^③此戈上的夔纹已经云纹化, 但夔形的独特设计遗韵犹存。

长胡三穿, 直援, 援锋呈圭首形, 胡部弧度较大, 援身上仰, 内下端角有边刺, 上端低于援部而不出齿。戈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长柄冷兵器, 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长柄戈在作战时能大范围挥击, 可钩可砍, 具有较强的杀伤力。^④当年这逼人的冷光寒气, 已经化作历史文脉的遗绪, 面对如此精致的一件件青铜兵器, 人们很难再去想象那金戈铁马的生死搏杀。

(5) “铜啄锤” 图 4.22: 长 12.2 厘米, 宽 3 厘米, 援基厚 2 厘米。

这是一件实战兵器, 饮过血的兵器才是好兵器。灵台白草坪出土的这件管銜铜啄锤, 无疑经历过征战、饱饮过鲜血。从它的结构上来看, 由援、銜、锤一体铸成, 形成一个钝口的凿子。

銜, 《说文》解释为“斤斧穿也”。就是斧头上装柄的孔, “谓斤斧之孔所以受柄者”。就是说, 这件兵器是带孔的, 并且在孔中安装有长柄, 木质长柄腐

① 作者拍摄

② 西周夔纹三穿戈. 《甘肃日报》, 2002. 08. 20.

③ 西周夔纹三穿戈. 《甘肃日报》, 2002. 08. 20.

④ 西周夔纹三穿戈. 《甘肃日报》, 2002. 08. 20.

朽消失，只留下青铜啄锤。椭圆的釜宽出援两头贯通，这是用来安装木柄的地方，釜面上还装饰上了三道弦带纹。从这些纹饰可以看出，这件兵器是被工匠精心铸就，非普通兵器。

釜与锤之间为圆柱形短颈，颈后为一个球形锤。锤与援分布釜的两侧，既起平衡作用，也能够增加劈啄的力度。安装了长木柄的啄锤，挥击劈啄，其杀伤力丝毫不亚于利刃尖锋，其坚固沉实，打击点集中，能够轻松以重力取胜。这件青铜啄锤，应当是一种来自外域的兵器，源于公元前 2300 年—公元前 2100 年间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管釜啄，是管釜啄与以柄端重锤击地的“殳”的结合体。自夏商以来，我国铜兵器装柄的传统方式是将扁平的武器器身内嵌入木柄的中缝，然后用细革条通过穿孔多道捆扎缠缚，将器身与木柄牢牢绑在一起，比如戈、钺等。管釜贯通安装木柄，是中亚地区流行的武器形制，最早是北方游牧文化的特色，后来，管釜技术也逐渐被中原文化吸收利用，将其应用到实战兵器和礼仪兵器上。

这些带有强烈异域色彩的人头戟、虎钺、啄锤出现在奴隶主贵族墓葬之中，显然符合他们地处周王朝西部边陲的审美特征。2000 多年以前，奴隶主贵族们带着车马剑戟和一大批随葬品长眠于此，沧海桑田，恍如隔世，曾经的威严、功勋都随着躯体化为泥土，但这些精美绝伦的器物再次重见天日之时，让我们叹为观止，留下了无限的遐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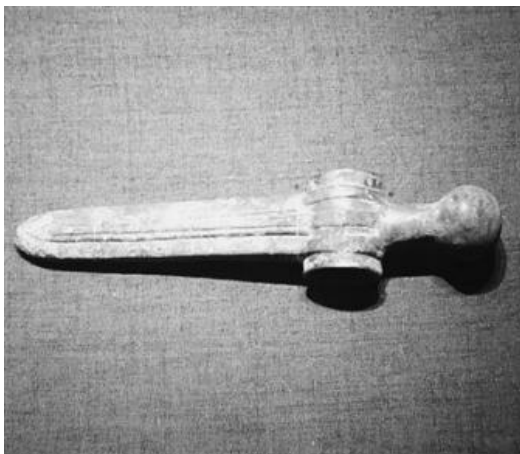


图 4.22 甘肃灵台白草坡铜啄锤^②

① 李利军. 白草坡：被淡忘的历史记忆符号，《平凉日报》，2006. 01. 17.

② 青铜啄锤. 甘肃文化, 中国甘肃网 (gscn.com.cn).

4.1.4 车马器类

灵台白草坡墓群车马坑：车马坑陪葬制度是西周墓群的典型制度。坑内四匹马骨骼排列整齐，而且马车车轮印迹清晰，各种车马饰器散落坑内。

首先是铜车辖和铜车𨾏的造型设计特征，𨾏呈圆筒状套在车轴的两端。𨾏上有孔，用以纳辖。商代晚期，出现了青铜铸造的车𨾏，𨾏上和轴端有一横穿的孔，插入略呈条形的部件辖，使𨾏固定在轴端不致脱落。铜𨾏出土时分别在车轴的两端，为细长圆筒状，一头粗，纳于轴头上，另一端细而有顶。

(1) 这件战国铜车辖、𨾏组合（如图 4.23）：𨾏长 21.3 厘米，内径 5.5 厘米，辖长 5.5 厘米是常见的圆柱形。

𨾏身饰四瓣蕉叶纹和牛头纹。车辖一端为兽面纹，车𨾏器身与顶端都饰有几何纹饰；造型规整，纹饰清晰。圆柱形器为“𨾏”一套在车轴的两端，用以加固轴头；插在车轴末端与车𨾏孔内的长条形构件是“辖”，车辖与车𨾏配合使用，插入车轴末端的方孔内，以防车轮脱出，为马车的安全行驶提供保障。

(2) 铜銮铃：是古代马车上的装饰配件。

銮铃主要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先秦时期，銮铃的使用可代表车主人的身份，最高级别的马车上可装八个銮铃，古代帝王的车驾上就为八个，故帝王车驾的代称有銮仪（帝王的车驾及仪仗）、銮驾、随銮、迎銮。上部为铃体，下部为铃座。铃体外缘呈椭圆形，正背面的中部为半球形铃腔，正面自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等距分布五个或六个三角形镂孔。^①下部銮形座呈上端略细的长方体，其正背两面的上下端分别有一个或两个不规则形穿孔。^②

(3) 铜弓形器：器物整体素面，而关于弓形器的用途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大概是缚在弛弓外面以保持弓的弧度，是弓的辅助工具。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器物在墓葬中多出于死者系在腰带上使用的工具“挂缰器”，即古代的马车驭者或骑手用来绊挂马缰而解放双手的工具。弓形器在中原地区流行于商代后期和西周早期。

(4) 马饰有头络（如图 4.24）马饰和兽面饰、牛头饰，络头、衔、镳、当

① 侯懿航. 梁带村芮国墓葬金、玉器艺术研究[D]. 西安美术学院, 2022.

② 姜涛;王龙正;王胜利;廖佳行;冯陆平;娄金山;王同绪;鲁红卫;杨青龙;陈英;陈素英;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 2007-03-25

卢、三花。古人驯马，除了原始的简单绳套不计之外，最先采用的正式马具就是“络头”，它的基本结构在秦代就已经定型，没有纹饰。



图 4.23 甘肃灵台白草坡车饰

上：铜弓形器 中：铜车辖和铜车害 下：铜銮铃^②



图 4.24 甘肃灵台白草坡头络马饰^①

4.2 青铜器造型艺术设计中所体现的审美特征

4.2.1 纹饰与节奏韵律之美

在西周青铜器纹饰中，审美与宗法制是两个重要且密切相关的主题。审美，即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是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设计基础，它体现了当地当时人们对美的理解和追求，传统西周的宗法礼仪制度和不同器物纹饰设计特征构成了灵台地区西周青铜器纹饰的独特审美和象征意义。

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物大多属于西周初期，其审美观念仍然沿袭了殷商时期青铜艺术风格的延续，但纹饰的设计已经开始简化，图案更富有趣味性。






① 作者拍摄




② 作者拍摄

从纹样的题材来看，幻想和仿生的动物纹饰具有明显特征，富有线性的几何图案增多。兽面纹被简化和分解，发展为装饰性的图案，失去了前朝的威严与神秘。

西周时期，腹部上的纹饰是整个青铜器纹饰的核心部分，采用中轴对称的主纹，纹饰分凸花和平花（见表 3.1）。随着纹饰不断丰富，主纹之上饰阴刻线，主、地纹结合，使得整个器物更加完整，富有层次的变化。白草坡出土的青铜盃、青铜罍、等酒器，都采用了简化的兽首装饰，器物颈部采用几何纹、勾连纹等，腹部光滑，整体纹饰虚实结合。其中提梁卣、青铜尊中都出现了对称的简化式对凤纹，体现“凤鸣岐山而周兴”的寓意。

表 4.1 甘肃灵台白草坪青铜器纹饰

纹饰名称	纹饰图片	纹饰
几何纹		
勾连纹		
卷云纹 云雷纹		
勾连纹 卷云纹		

对凤纹		
兽面纹 卷云纹		
兽面纹 勾连纹 云雷纹		

古人在造物的时候把人类社会遵循的处世之道、社会政治意识和审美思想灌注于造物活动中。其中包含了古人的造物的工艺技术和智慧，这些纹饰不是胡乱地堆砌，而是非常讲究反复与对称、平衡与布局、节奏与韵律、线条与组合、空灵与充实等。^①例如青铜酒器、食器上的饰带纹，都是均衡排列，以及器腹上的兽面纹等，都是对称分布，与几何纹相互映衬。

4.2.2 器物与和实生物之美

西周史伯最早提出“和”的概念，它把“和”与阴阳五行结合联系起来，侧重物、色、味、和文、声、听形式之和，使之达成和谐之美感。《国语·郑语》中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之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②

这也就是说，“和”是不同元素的结合，不同、差别是“和”的前提，这样的“和”才能长久，“和成”的物才能丰长。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朴素的辩证文化思想，而如今沿用至青铜器物的设计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政治属性开始显现，商王乃至全国崇尚神学，鬼神观念盛行。通天地、侍奉神、成为青铜器造型设计理念的第一位功能，明贵贱、别等序、记功烈、昭明德、严格社会秩序、抚慰麾下僚属是它的第二位功能商人信奉上

^① 梁丹;张洪亮. 先秦青铜纹饰的美学思想,《艺术教育》,2014. 12. 01.

^② 刘亚楠;张永超. 论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价值建构,《领导科学论坛》,2017. 08. 23.

帝神、祖先神、自然神，祭祀祷告活动是商代贵族重要的政事。^①

专家学者在研究一段历史背景，不仅是根据当时代遗存的古籍，更多的是当时代出土的文物，文物上的装饰纹饰、造型、铭文都是了解历史有力的证据。青铜器上的刻印，以浓厚的地域色彩，蕴含着幻想中巨大的原始力量，象征神秘、威严、恐惧的艺术特征。^②

以鼎为例，早期造型多为厚重的立耳、锥三足、方形器腹。到了周朝，以宗法家族为核心，形成礼乐制度，不再着重于祭祀和享乐，更多的便是作为食器和礼器使用，“民以食为天”。通过天子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享用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大夫三鼎两簋的制度体现出对人的重视，人文精神成为主导，随理性精神的不断强化，动物纹饰不只是通天的媒介，而且有了自身的内涵，象征着吉兆。

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物，不论是酒器、食器还是兵器，形制都是丰富多样化，器型的设计逐渐以人为本，为人所用。而且其设计形制受到了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影响，例如青铜提梁卣的形制便是模仿了北方游牧民族用桦树皮卷筒状作器物的生活方式，从运用树皮组成形状来为人所用，到后来发展为制作青铜器物以便于生活之用，再加以彰显地位的纹饰、造型用来陪葬。这期间从自然中的发现到历代的传承，无不体现“和实生物”的观念。人头形青铜戟，在兵器的上方铸异族的人头形象或首领形象，二者合为一体，使本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成为了炫耀战功的利器，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甘肃地区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交流”。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残忍的手法，对于现在社会而言，这便是狰狞之美、文化融合之美，西北军事将领与鬼方、玁狁、戎狄等异族人之间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

4.2.3 礼制与篆引铭文之美

“篆”和“引”在《说文解字》中本是两个字，但现在我们把“篆引”作为专用名词，是用来衡量古文字象形符号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特征风格。其中的“篆”代表篆书线条的等粗、排列组合中的等距、等曲、等长；“引”代表书写的转引

① 部学海. 先秦艺术史 [M]. 山东: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② 梁丹. 张洪亮, 先秦青铜纹饰的美学思想, 《艺术教育》 2014. 12. 01.

的“中锋”笔法。^①“篆引”问题很重要，理解了“篆引”，其实就理解了篆书笔法，理解了篆书笔法。

铭文是对于西周礼制的记载，对于礼乐精神的印证，铭文所承载的礼乐精神早已被器物所赋予和体现。青铜器用于西周社会的各种礼仪场合，它所载录的铭文或记录册命，或叙述战争，或呈现诚心，或宣誓盟约，这些铭文侧重点虽然有别，但都在强调一种权力。^②

青铜铭文蕴含着强烈的文化精神，它是神权的象征、西周礼制的固定化和符号化，体现着家族意识和历史意识。例如白草坡出土的徙遽篋青铜盃，内刻铭文：“徙遽作父己”。“徙遽”为官职，“己”是一名叫做己的父亲所做的祭器。吕姜铜簋中的铭文“吕姜作簋”也是一名叫吕姜的女子嫁到了密须国。灵台县洞山村出土的青铜大鼎内部的族徽很可能就是象征家族意义。

西周是宗法制的社会，而宗法制的核心便是血缘关系，大宗占据主导位置，小宗服务于大宗。宗法、血缘关系的强调使个人的位置和价值必须在家族中才能体现，强烈的家族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反映于浓缩周人思想和智慧的青铜铭文中。^③具体而言，便是铭文对祖先的颂扬和对子孙的祈福，所以《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④

根据文献记载，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时期的大孟鼎，腹部的内壁上有铭文291个字全文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的册命、封赏此孟的事件如图3.25。铭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接受天命及武王赧灭殷商的功德，并且以商人酗酒亡国的事件引以为戒，从中吸取教训，告诫他要效法前辈、恪尽职守。^⑤而后，周王册继承了祖父南工之职，掌管军务，辅佐周王治理天下，赏赐盃酒、服與、人等大批物品。^⑥希望该荣耀永远流传后世。为感谢王命并盛赞周王美德，盃制作此器以祭祀其祖先南公。

① 张翀. 从伯懋父簋墨书蠡测商周书法;《形象史学研究》2015-06-30

② 刘全志. 论西周青铜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10-15

③ 刘全志. 论西周青铜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10-15

④ 吴承学;林岗;胡大雷;朱迎平;何诗海;彭玉平;左鹏军;刘湘兰.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20180906(1)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8-12-03

⑤ 翟胜利. 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 艺术品, 2022, (01):108-115.

⑥ 翟胜利. 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 艺术品, 2022, (01):108-115.

另外还有一件小孟鼎，整篇 400 余字。西周时期青铜器上铭文的含义，不再是祈求先祖、降福民众，而是歌功颂德，紧固宗室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得到了职位、赏赐、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对王的崇敬，以及对先人追求王的功绩的敬仰和对后世子孙的期许，便开始制作祭器。^①在祭祀仪式中，多了对现世人生的激励，少了对神灵的恐惧和祈求，包含了积极的价值理想，已经向“真正的宗教”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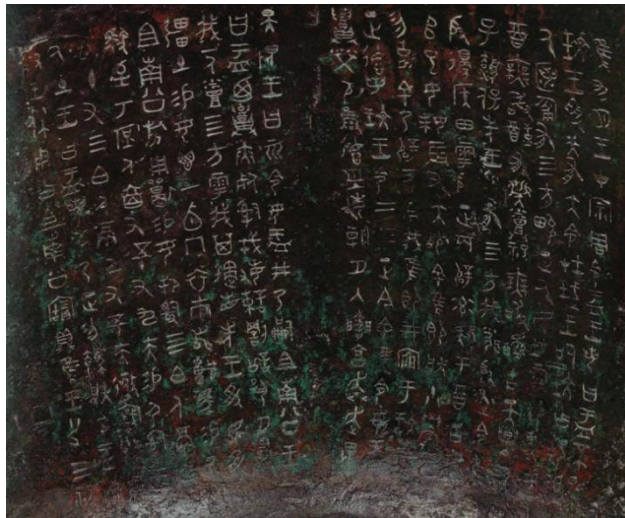


图 4.25 大孟鼎铭文^②

5 甘肃灵台白草坡青铜器中所体现的审美文化解读

5.1 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指美在感性形式中体现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人们感受到的美通常是通过具体的感性形式显现出来的。^③青铜器物的审美价值指的是器物本身所具有的美学价值，这种价值往往与器物的文化内涵密切相关。器物的审美价值可以体现在器物的形态、色彩、材质、工艺不同方面的设计。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其造型优美、工艺精湛，不仅是一种实用器物，更是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

① 陈春会. 西周青铜礼器演变与宗教政治观之变革[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3(06): 16-20. (11): 1-15.

② 翟胜利. 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 艺术品, 2022, (01): 108-115.

③ 张煜. 古滇国青铜器的审美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 2017.

青铜器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从青铜器的时代性和设计艺术的变革可以看出，审美与实用是对立统一的，从象征性装饰向艺术性设计的转变，是主流的逐渐过渡。^①甘肃灵台白草坡的审美价值给后人带来的不仅只有一种审美愉悦感，而是透露着时代、地域背后一方将领要保卫国土的豪情壮志，外在形式之美与内在美的统一，让甘肃人民去欣赏、去热爱、去追求包含在内的精神之美。

甘肃的青铜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独特的地域位置上，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明显的西北特色，例如器型高大、纹饰精美却不失粗狂豪放、造型夸张等，出现了其他地区未曾有的特殊形制和动物造型，这些艺术特征都反映了当时甘肃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文化。在创造的过程中，从纹饰、造型用途方面结合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文化特色，从繁缛的兽面纹到简单立体的几何纹，从豪放的镂空雕刻到细密的阴刻线，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熏陶，从而映射出军权、王权的力量。甘肃地区青铜器的地域特色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2 社会意义

在西周时期，周朝与鬼方、玁狁、戎狄等发生冲突与当时期的民族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在西周早期，周与这些异族关系和谐，周之克商，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对于西北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后又在周公的“敬德保民”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德化怀柔”为主，武力征伐为辅的政策。成康之后，周王朝实力强大，对原有的政策体系不满，对犬戎进行讨伐。周穆王之后，由于周朝政策变化，加之气候变化，西北灾害不断，戎狄生存遇到威胁，便掠夺频繁。周王朝一方面要统治各地区疆域，一方面要抵御西北异族的侵袭，并派遣重要军事将领在此镇守。

青铜器物自商代以来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程和文明成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不断提

^① 孔凡娟. 审美价值的诗性哲学特征[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 (06): 14-18.

高，人们开始制造出各种不同的器物来，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开始用器物来表达内心世界、审美意识、社会地位等。

西周王朝成为统治阶级，其借以青铜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并没有改变，周代初期延续了商代人对祭祀的重视，而后慢慢开始向着伦理道德文化转变，但青铜器在祭祀场合中依然首当其冲。直到中后期，社会稳定，礼制化思想体系深入人心，人们便开始歌功颂德、敬祖重德，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构建出具有礼制化的审美观念。首先在器物的造型上，注重层次的表达，技法更为讲究，体现平面、立面的对比融合。青铜器慢慢由祭祀器物、酒器居多逐渐变为食器、礼器、乐器。相比于商代的威严、震慑，西周青铜器更加注重礼制约束，更加突出一些地域性、民族性的独特设计。其次是纹饰，以多元化、丰富层次美感，线条的长短、粗细、直曲结合，还特别运用“三层花”如此精美复杂的纹饰。白草坡出土的人头形青铜戟、铸羊首或牛首装饰在青铜器上，制作工艺和设计风格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与草原民族和中原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

西北地区作为西周时期重要的军事重地，当地的军事将领享有如此高规格的青铜礼器，从一种甘肃地区出土的器物来体现该地区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意识形态、文化交流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发展历程。

5.3 文化内涵

文化内涵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为深层次、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也包括了人们对美的感受和欣赏。在器物中，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是紧密相连的。

青铜器物是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在文化研究中，青铜器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内涵的体现。

青铜器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其物质属性上。器物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的物品，它们通常具有实用性、审美性和象征性等属性。实用性是器物最基本的功能，如食物器皿、生活用品等，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审

美性则是器物在形式、色彩、纹饰等方面的审美价值，不仅是青铜器，还有古代瓷器、玉器等，它们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象征性则是器物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如古代青铜器、玉器等，它们代表了特定文化的精神内核。而在白草坡西周墓葬群中，出土玉器众多，除了在 1 号墓和 2 号墓各出土一件玉人之外，还出土了玉璧、玉璜、玉柄形器、戚、玉蝉、玉鱼、玉笄、玉鸟、玉环、玉琥、玉圭以及石器 30 余件。玉人形象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商代，更多人形玉器出现。这些玉人形象虽然各异，但互相之间有一定联系，有的形象被神化，有的是现实人物的写照。它们体现着先民们对人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神人的崇拜。^①

其文化内涵体现在其历史传承上：青铜器物是历史的载体，承载着过去的社会文化信息。通过对器物的形制、纹饰、材质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工艺水平、审美取向。古代的青铜器、瓷器都反映了我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以及当时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也体现在其社会功能上：器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反映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等。例如，古代的礼器、祭器等，它们是当时社会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社会秩序的关注。

另外体现在其文化表现上：器物作为文化现象，其内涵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其文化表现形式上。器物的形制、纹饰、色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

5.4 审美与历史文化的联系

青铜器物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器物的审美价值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器物所反映的社会风貌、审美观念和技艺水平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例如，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具有严格的礼仪制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和文

^① 学术网文风物志. 白草坡神秘玉人，揭示 3000 年前镇抚陇东的一方诸侯 <http://m.thepaper.cn>

化传统。而古代瓷器则以实用为主，同时融入了审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器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之间交流互鉴。自古以来，中国器物在国际享有盛誉，吸引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目光。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器物也受到了中国器物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例如，汉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器物大量输出到西亚、欧洲等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器物在审美价值上，不仅体现了各自国家的文化特色，还成为东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交流的载体。

器物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的保护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与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器物的审美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博物馆、制定保护法规等，为器物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世界各地也积极开展了对器物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如修复、研究、展示等，使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器物得以永续传承。

综上所述，器物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紧密相连。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器物，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器物的审美价值，还能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因此，在保护与传承器物的同时，我们还需深入研究器物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甘肃地区青铜器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我国青铜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更体现在其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甘肃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结语

通过研究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深入挖掘其审美特征和文化特征，揭示了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风貌，对于我国古代艺术设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总结出以下几点研究成果。

首先，甘肃地区青铜器的设计形态呈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其艺术表现手法和精湛的工艺反映了该地区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此外，甘肃地区的青铜器还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青铜器

类型丰富，包括礼器、食器、兵器、车马具等，这些出土的器物与周边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包含独特的西土特点，展现甘肃地区独特的审美观念。

其次，甘肃地区青铜器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体现古代先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该地区青铜器纹饰以动物纹为主，如牛、羊、鸟、鹿等，其中不乏融入云雷纹、回纹、卷云纹、几何纹等。这些纹饰栩栩如生，线条流畅，充满韵律感。纹饰设计中的细节处理，如动物的眼睛、羽毛都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追求、对设计的创新。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和信仰，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通过对这些青铜器纹饰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进一步丰富我国古代艺术研究的内涵。白草坡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艺术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甘肃地区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格、丰富的纹饰图案、优良的材质特点和艺术价值，成为古代艺术中的瑰宝。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发现更多的青铜器艺术风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审美体验，这项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对于保护和传承我国古代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审美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审美也是人类心灵深处的共鸣，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在对甘肃地区青铜器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审美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各个方面，提出启示和建议，以便于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以便于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变迁，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传承、发扬，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创新做贡献。

参考文献

- [1]陈春会. 西周青铜礼器演变与宗教政治观之变革[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3(06):16-20. (11):1-15.
- [2]初仕宾.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J]. 考古学报, 1977, 10:15.
- [3]崔勇. 中原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辨证[J]. 黑龙江史志, 2014, (05):41-42.
- [4]戴小波. 涟源市出土一件商代铜卣[J]. 文物. 1996, 4.
- [5]翟胜利. 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 艺术品, 2022, (01):108-115.
- [6]翟胜利. 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 艺术品, 2022, (01):108-115.
- [7]杜书瀛. 关于形式——论审美价值的特性之一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4):65.
- [8]甘肃岷县文化馆. 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R]. 考古, 1985, 2:97.
- [9]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R]. 考古, 1996, 11:51.
- [10]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R].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141—142、151.
-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R], 考古, 2009, 10:15、23.
- [12]贾澎. 青铜铸造设计中的文字特制及文化表达——评陕西商周青铜艺术的当代设计转化[J]. 铸造, 2021, 70(07):893.
- [13]姜俊华. 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J]. 丝绸之路, 2020, (03):67-71.
- [14]姜涛;王龙正;王胜利;廖佳行;冯陆平;娄金山;王同绪;鲁红卫;杨青龙;陈英;陈素英;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R]. 华夏考古, 2007. 03-25.
- [15]柯马丁, 陈彦辉, 赵雨柔. 从青铜器铭文、《诗经》及《尚书》看西周祖先祭祀的演变[J]. 国际汉学, 2019, (01):25-52+2.
- [16]孔凡娟. 审美价值的诗性哲学特征[J]. 甘肃社会科学, 2015, (06):14-18.
- [17]黎婉欣. 论商后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人兽结合纹饰与造型[J]. 江汉考古, 2021, (02):54-63+52.

- [18]李广庆. 谈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J]. 黑龙江史志, 2012, (07):12-16.
- [19]李利军. 白草坡: 被淡忘的历史记忆符号[R]. 平凉日报, 2006, (01):1-17.
- [20]李乔生. 湖南宁乡县横市镇出土一件商代提梁卣[J], 考古, 1999, 1-11.
- [21]李仲立, 刘得祯. 密须国初探[J].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04):101-105.
- [22]梁丹;张洪亮. 艺术教育. 先秦青铜纹饰的美学思想[J]. 2014, (12):01.
- [23]刘彬徽. 两广先秦青铜器研究[J]. 东南文化, 1991, 1:124.
- [24]刘全志. 论西周青铜铭文蕴含的文化精神[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10:1-15.
- [25]刘学堂, 李文瑛.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C]藏学学刊(第3辑). 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1-64.
- [26]刘学堂.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收藏与投资, 2017, (06):68-75.
- [27]刘亚楠;张永超.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建构[J]. 领导科学论坛, 2017, (08):1-23.
- [28]柳扬. 灼灼其华: 西周青铜器纹饰中的花冠鸟[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3, (09):56-73.
- [29]罗樾, 张乔. 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J]. 新美术, 2016, 37(01):27-36.
- [30]马林伟. 关于密须国的几点认识[J]. 才智, 2014, (03):2-7.
- [31]倪玉湛. 从“描述”到“阐释”——商周青铜“鼎形器”形制的设计学考察[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4, (01):106-111.
- [32]倪玉湛. 夏商周青铜器设计中技术与艺术的互动关系[J]. 装饰, 2015, (11):85-87
- [33]孙淑云、韩汝汾. 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作技术研巧[J]. 文物, 1997, (7), 79.
- [34]陶兴华 陈俊德. 青铜文化的甘肃印迹[R]. 甘肃日报, 2020, (09):1-9.
- [35]王斐. 青铜器纹饰之美——以安徽枞阳出土青铜方彝为例[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5):1-12.
- [36]吴承学;林岗;胡大雷;朱迎平;何诗海;彭玉平;左鹏军;刘湘兰.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J]. 学术论文联合比对库, 2018, (12):03.

- [37]谢尧亭, 褚孝文, 范文谦等.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发掘简报[J]. 考古, 2019, (01):15-59+2.
- [38]熊建华. 湖南出土青铜壶形提梁卣的梳理与断代分析[J].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2014, (00):112-122.
- [39]熊建华. 湘潭县出土周代青铜提梁卣[M], 载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 岳麓书社, 1987.
- [40]徐建炜. 甘青地区新获早期铜器及冶铜遗物的分析研究[D], 北京科技大学, 2009, 21.
- [41]徐进. 古代青铜器铸造及其装饰纹样的视觉设计艺术研究[J]. 铸造, 2023, 72 (11):1533-1534.
- [42]严文明.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J]. 史前研究, 1984, (01):36-44+35.
- [43]阳飏. 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里的青铜王国[N]. 甘肃日报, 2016, (009):07-26.
- [44]余森林, 唐旻圆, 韩敏. 论青铜器狞厉纹饰的稚气之美[J]. 包装工程, 2017, 38 (10):214-217.
- [45]余永红. 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的虎造型及其内在含义[J]. 古代文明, 2016, 10(01):59-67.
- [46]张卉. 夏商周陶器与青铜器设计艺术关系探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8, (01):44-48.
- [47]张利军. 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06), 1-20.
- [48]张乔. 云雷纹与“礼”的观念[J]. 新美术, 2012, 33(04):71-81.
- [49]张威媛. 中国青铜鼎造型与纹饰风格的演变[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5, 2 (12):142-145.
- [50]张亚初. 对商周青铜盂的综合研究[J],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慕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集, 科学出版社, 1986. 60.
- [51]张长寿. 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J]. 考古学报, 1979, (03):276.
-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巧所. 值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R], 北京: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巧所甘肃工作队.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R], 考古学报, 1974, (2):53—54.

- [54]朱尽晖. 从商周青铜器的审美意识反观当下中国美学[J]. 新美术, 2017, 38(09):92-95.
- [55]朱军献. 东周青铜器造型与人物画像纹饰[J]. 中原文物, 2017, (04):61-67.
- [56]宗立成, 罗彩云, 尹夏清. 早期中国的造物设计哲学观念阐释[J]. 包装工程, 2020, 41(22):15-20+65.
- [57]宗立成, 于瑛芝. 先秦造物设计思想及豆灯形制设计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 (05):35-39.
- [58]部学海. 先秦艺术史 [M]. 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1-444
- [59](春秋)孔丘著. 尚书周书[M]. 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4.
- [60](春秋)左丘明. 春秋左传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61](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 [6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 辞海.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 [63]葛培岭注译. 诗·大雅[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 [64]郭宝均. 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M]. 文物出版社, 1981, 1-217
- [65]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M]. 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7.
- [66]李泽厚. 美的历程[M]. 文艺理论著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273
- [67]容庚、张维持. 殷周青铜器通论[M],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46.
- [68]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编. 商周青铜器纹饰[M], 文物出版社, 1984.
- [69]丝路文化大辞典. 虢季子白盘铭[M]. 兰州:红旗出版社, 1995.
- [70]王国维. 观堂集林·说孟(卷三)[M], 北京中华书局年. 1959. 1
- [71]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卷)[M],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图版一三八.
- [72]周泗阳.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
- [73]祝中熹. 密须史事考述, 古史钩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308—309.
- [74]祝中熹. 敞口尊饰对凤纹[N]. 甘肃日报, 2004, 02, 13.
- [75]祝中熹. 从黄帝传说看甘肃古史影迹[N]. 古史钩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25.
- [76]毕经纬. 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 [77]查飞能. 商周青铜器自名疏证[D]. 西南大学, 2019.

- [78] 邓芳（导师：郑峰;贾建威）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人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专业：文化遗产）；2022.
- [79] 邓芳. 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人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22.
- [80] 关婧雯. 周代形式美思想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 [81] 湖南省博物馆. 新邵、浏阳、株洲、资兴出. 土商周青铜器[J]，载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
- [82] 李云朋. 商周青铜盃整理与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 [83] 刘晓. 甘肃早期青铜器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 [84] 马玉. 礼县早期秦墓葬群金属器动物纹样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20.
- [85]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刘晓. 甘肃早期青铜器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 [86] 王冰. 东周时期秦国青铜器纹饰研究[D].
- [87] 王璐. 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D]. 北京科技大学, 2019.
- [88] 詹婷. 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 [89] 张煜. 古滇国青铜器的审美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 2017.
- [90] 朱光华（导师：陈旭）早商青铜器分期与区域类型研究；郑州大学，博士（专业：商周考古与商周史）；2005.

附录

图 3.1 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地图(图片来源:姜俊华.西周时期密国的战略地位[J].丝绸之路,2020,(03):67-71.)

表 4.1 甘肃灵台白草坪青铜器纹饰

图 4.1 偃师二里头陶盃(图片来源:李云朋.商周青铜盃整理与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图 4.2 甘肃灵台白草坡父辛青铜盃(图片来源:铜盃-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http://www.gansumuseum.com/dc/show-614.html>)

图 4.3 甘肃灵台白草坡徙遽广僕青铜盃(图片来源:徙遽广僕铜盃-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4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盃(图片来源:#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用文物讲述黄河流域青铜文#<https://weibo.com/1704131137/ND8GPab2A>)

图 4.5 甘肃灵台白草坡β 爰伯青铜牛首提梁卣(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 4.6 甘肃灵台白草坡灋伯青铜羊首提梁卣(图片来源:灋伯铜提梁卣-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7 甘肃灵台白草坡β 爰伯青铜尊(图片来源:β 爰伯铜尊-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8 甘肃灵台白草坡父丁铜角(图片来源:伯作铜爵-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9 甘肃灵台白草坡伯作铜爵(图片来源:父丁铜角-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10 甘肃灵台县洞山村青铜大圆鼎(图片来源:青铜大圆鼎-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11 青铜大圆鼎铭文(图片来源:青铜大圆鼎-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一)

图 4.12 甘肃灵台白草坡伯铜方鼎(图片来源:伯铜方鼎-精品赏析-甘肃省博物馆(gansumuseum.com))

图 4.13 甘肃灵台白草坡铜分裆鼎(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图 4.14 甘肃灵台白草坡卣 爱 伯铜簋(图片来源:卣 爱 伯铜簋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15 甘肃灵台白草坡吕姜铜簋(图片来源:西周“吕姜”铜簋,一件陪嫁品扑朔迷离的历史_西部地理_甘肃文化产业网 (gansuci.com))

图 4.16 甘肃灵台白草坡均铜甗(图片来源:匀铜甗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17 镂空鞘青铜短剑(图片来源:镂空鞘青铜短剑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18 有鞘短剑(图片来源:西周剑与剑鞘图片_百度百科 (baidu.com))

图 4.19 头形盃青铜戟(图片来源:头形盃青铜戟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20 甘肃灵台白草坡虎纹铜钺(图片来源:虎纹铜钺 - 精品赏析 - 甘肃省博物馆 (gansumuseum.com))

图 4.21 夔纹三穿戈(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 4.22 甘肃灵台白草坡铜啄锤(图片来源:甘肃文化 | 一件青铜啄锤 投射出西周早期对外文化交流_甘肃文化_中国甘肃网 (gscn.com.cn))

图 4.23 甘肃灵台白草坡车饰上:铜弓形器 中:铜车辖和铜车害 下:铜盃铃(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 4.24 甘肃灵台白草坡头络马饰(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图 4.25 大孟鼎铭文(图片来源:翟胜利.国之重器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概览[J].艺术品,2022,(01):108-115.)

致 谢

回首顾望，研途慢慢，始于桑落，别于荷月，提笔谢辞，落笔为终。三载悠悠，不忘恩师。首先感谢我的导师牛勇教授，在刚入学之时便开始督促我们制定计划，不断学习，完成每一阶段的学习任务。一直以来给予我们鼓励式的教育，对于每次不尽如人意的想法和论文，从未有过批评和重话，始终和蔼可亲，耐心与我们沟通、交流、探讨、解惑。让我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面对困惑，老师的品德和人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在论文的开题和撰写中，也耐心指导，能够顺利完成论文，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感谢我的父母，辛苦养育我二十多载，竭尽所能地为我的学习和生活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会尊重我的每个选择、每个决定，在我中考、高考、考研的人生重大时刻，都给予我鼓励，父母永远是我背后最可靠的大山。所得吾亲人，皆是我幸愿你们长久安乐，岁月无恙。

倾盖如故，不忘久要。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但回头看，在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遇到了与自己同频共振的人，感谢我的同学们及师哥、师姐们，很庆幸这三年与你们一同走过，在平时的生活学习中，我们关系融洽，经常与同门们探讨，相互学习，在枯燥的学习生涯中多了一份轻松自在与喜悦。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也感谢那个匍匐前行却从未停下脚步的自己，回首十多年的求学之路，也算是“潺潺流水穿过群山一座座”。一路的跌跌撞撞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研究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找到人生方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可能性。一路走来只有自己知道这路途的艰难，去寻找快乐、豁达、平和。有幸能够任甘肃省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通过培训考核，背诵大量的文献资料，每当我站在展厅前为大家讲述甘肃的历史；丝绸之路的历史，我无比自豪且深深热爱着我的家乡。

文末搁笔，思绪繁杂。曾经读到过一句话：所有的经历都是学习。三载寒暑，有喜悦有酸楚，有疑惑，有豁达，所有精力，于我都是礼物。所有的相遇，于我都是宝藏，人生庸长，苦是常态，愿未来进入社会洪流的我依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塔。谨以此文来敬即将结束的学生生涯。毕业快乐！

2024年1月5日